

恩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6N.2 總 99 2026/05

美國250年國慶：在矛盾與糾葛中重振自由的光輝 P.2

America's 250th Anniversary:

Renewing the Glory of Freedom amid Tensions and Entanglements



面對戰爭，基督徒應有的警覺 P.8

The Vigilance Christians Need in the Face of War

中國教會為何需要教會論？ P.23

Why the Chinese Church Needs Ecclesiology?

AI時代的講台：講道語言更趨向主觀化 P.27

The Pulpit in the Age of AI: The Growing Subjectivity of Preaching Language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詩三十三12)

恩福

2026年5月 第二十六卷第二期 總99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 媽
特約編輯 劉良淑
校對 田 玲
英文編輯 李晏戎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插圖 程志堅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恩福網站: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雜誌網頁: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Blessings

Vol. 26, No. 2, May 2026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Executive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Proofreading: Ling Tian
English Editing: Andrea Lee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Illustration: Zhijian Cheng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4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26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當前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徐志秋、陳愛光、蕭康、陳宗清、陳永昌、陳惠琬、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蘇文峰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美國250年國慶：在矛盾與糾葛中重振自由的光輝 2
America's 250th Anniversary:
Renewing the Glory of Freedom amid Tensions and Entanglements 劉良淑
- 不傷人，不害物 封底
Neither Hurt Nor Destroy 程嫣兒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專題：戰火中的中國教會 — 《追尋和平的國度》選文 8 - 22
Special Topic: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 Fires of War — Selected Readings from *Pursuing the Kingdom of Peace*
- 面對戰爭，基督徒應有的警覺 8
The Vigilance Christians Need in the Face of War 陳宗清
- 末後必有之事 10
Things That Must Take Place in the Last Days 約書亞
- 抗戰和內戰時期，中國學生復興運動 12
The Chinese Student Revival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ivil War 孫澤汐
- 冷戰下的基督教民主敘事 14
The Christian–Democracy Narrative in the Cold War Context 柏雨成
- 中共戰時體制與基督教政策 17
The CCP's Wartime System and Its Policy toward Christianity 李泉
- 戰時華人教牧的流動性/不流動性及其啟示 20
The Mobility and Immobility of Chinese Pastors in Wartime: Implications and Lessons 王約旦
- 中國教會為何需要教會論? 23
Why the Chinese Church Needs Ecclesiology? 葛牧之
- AI時代的講台：講道語言更趨向主觀化 27
The Pulpit in the Age of AI: The Growing Subjectivity of Preaching Language 陳道德
- 漫漫歸途：介紹《救贖與革命》一書 31
A Long Journey Home — Introducing *Salvation and Revolution* 孫澤汐
- 書評：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新教自由派的思想與生命之旅 33
Book Review: The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Journey of 20th-Century Chinese Protestant Liberalism 姚西伊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天上的阿爸與地上的兒女 34
Our Father in Heaven and His Children on Earth 天靈

美國250年國慶：

在矛盾與糾葛中重振

自由的光輝

劉良淑

摘要：本文摘自葛尼斯 (Os Guinness) 著作 *America Agonistes: America's 250th and the Restoration of a Nation in Conflict with Itself and Its Past* (2025) 的第一章和第九章。本書分析當下的美國，為何對自我形象和史實的看法嚴重撕裂，產生自毀性的矛盾與衝突，又如何因西方的危機落入漩渦，被世界的極權勢力拖累。作者探討：美國在慶祝建國250年之際，是否能重回立國之初的正確思路，並從自身豐富的歷史與文化裡汲取能量，為國家和全人類指出美好的前景？若是不然，美國可能逐漸一蹶不振，徹底失去從前的榮光。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chapters 1 and 9 of *America Agonistes: America's 250th and the Restoration of a Nation in Conflict with Itself and Its Past* (2025)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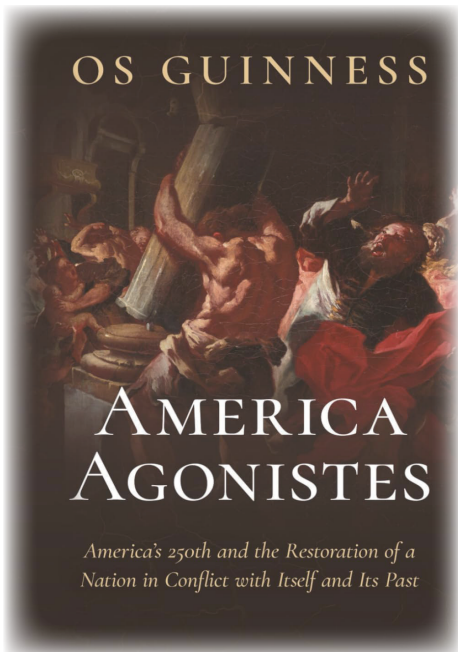
Os Guinness. It examines the profound divisions with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particularly the sharp disagreements over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truth, which have given rise to deep internal tensions and self-destructive conflict. It also considers how the broader crisis of the West has drawn the United States into a global landscape increasingly shaped by authoritarian forces. In light of its 250th anniversary, the article reflects on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can return to the foundational vision upon which it was established. Can it draw renewed strength from its ow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once again point toward a hopeful future for both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If not, America may continue to decline, gradually losing the freedom and moral clarity that once defined it.

美國，自由的鬥士

1776年，廣袤的美洲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國度。美國的締造者最了不起的地方，便是要建造一個自由的社會，而且能永保自由。這個遠見是大膽的、超常的；他們又用一種巧妙的方法來實現理想，就是建立「共和」(Republic)——依據法律與憲法來治理。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實驗。

二戰以來，美國，這宣稱「在神之下」的國度成為世上的領頭羊。美國慶賀建國200年時(1976年)，全國充滿自信，無比樂觀。1984年雷根的競選口號是「美國的早晨」。1989年共產主義崩潰，1991年蘇聯解體。當時美國形同挺立的巨人，睥睨天下。

然而僅僅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美國的氛圍顯然變了。民調一次又一次顯示，許多



人感到國家正朝錯誤的方向前進。及至美國建國250週年（2026年），過去幾十年的國際秩序似乎要土崩瓦解，「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受到嚴重的威脅。

一波歷史的海嘯正在高漲，衰落的西方文明有如巨浪，衝擊全世界，裹挾著龐大的黑暗、邪惡能量。共產中國和全球的獨裁主義，與反西方左派聯盟，與美國對立，形成了第二次冷戰。眼看世界的未來即將充斥著衝突、戰爭；而超智能統治的威脅也悄然蟄伏，令人不寒而慄。

這場海嘯要衝垮的頭號目標，是美國「自由的靈魂」。美國當初能偉大的根本原因無他，乃是革命先民「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在250年國慶時，是否有足夠多的美國人能看清：若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必須要再度肯定自由的寶貴？美國人是否仍願意奮不顧身地作自由的鬥士？

板塊正在移動

全球的結構板塊正在移動。曾被稱為「弱神祇」的無國界主義、開放社會、反威權運動（反種族主義、反法西斯、反國家主義、反民粹主義、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如今傾巢而出。世界已退回舊路，男性主義、種族主義、國家主義、霸權主義等「鐵血強神祇」，又大行其道。

看起來，世界正從以歐洲為主的時代轉向以歐亞大陸為核心——那裡曾是中國強大朝代的家鄉，是成吉思汗與帖木兒大帝征服之地。今天盤踞在該地的俄國、中國、伊朗、北韓，都是極權國家。這一波「歐亞世紀」正在與「美利堅治世」較勁。

現代的三個超級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是西方後基督教時代的產物。它們以「進步」的面貌出現，認為抽象的思想比真實的人更重要。它們各自築起了現代的巴別塔。

隨著AI、超智能、太空旅行等的出現，未來還可能有更可怕、更超級的主義嗎？「（無神的）自我為神觀」是否會登峰造極，以科技獨裁、救主式超智能、超人、超國家的形式登場，以宇宙原則和能力為靠山，以新的「神祇」身分來奴役天生有宗教傾向的普通人？

如今的美國，對內部和史實的認知衝突極大，對究竟「是什麼帶來過去的輝煌」，看法混亂。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自我矛盾得那麼厲害。人民猶如眼瞎，社會抽搐不已，領導階層對立分歧。

美國還能全國和好、恢復如初嗎？還能如同昔日一般，自稱是自由的國度，要維護人類的未來和自由嗎？

第二場三十年戰爭

美國立國的靈感顯然源於依據聖經的信仰。然而，美國的基督教根基早就被公然淡化或否定了。信仰弱化有三個因素：基督教自身的分裂、世俗化和所謂的「文化適應」。如今許多美國人想以十八世紀的啟蒙世俗主義來取代原初的理想。但是，歐洲的下場足能成為美國的前車之鑑。

後基督教時代的歐洲，產生人本式的「自由主義」。但是它有兩個缺陷：其一，這種「自由主義」無法證明必然能帶來興盛；其二，這種以人為衡量基準的自由，所釋放出的各種力量卻沒有人能駕馭，結果帶來了災難。

丟棄基督信仰的歐洲，很快結出悲慘的惡果。歐洲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是一段痛苦的宗教戰爭史。有人說，這是西方拒絕基督信仰之始，是啟蒙運動世俗主義抬頭之初

（這觀點有些道理，雖非全然正確）。而「第二場三十年戰爭」（1914-1945年），即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彷彿聚光燈一般，將啟蒙運動和各種現代世俗主義的醜態暴露無遺。在刺眼的光芒下，他們造出的威權政府、自視為超人的領袖和被奴役的人民，全都無所遁形。很快，歐洲便回到被基督信仰改變之前的古代狀況——就是屈服於權力。

五種可怕的光景

歷史來到二十一世紀。基督信仰遭到拒絕，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又軟弱無力，全世界陷入五種可怕的光景。

（1）權力成為最主要的運作原則，所向無敵。世界回到羅馬帝國或更早的情境：權力掌握在有魅力的個人手中，極權的帝國興起。啟蒙

主義強調的「理性」受到攻擊，被視為「歐洲權力」、「白人權力」、或「男性權力」。其實，理性、邏輯、數學、科學、科技，自身並沒有獨立性或力量，都可以成為權力的奴僕。

共產主義把「階級」神聖化，當作政治性的宗教，以此贏得權力；同樣，法西斯主義是用「國家」，納粹主義是用「種族」。現今西方和其盟國則把「受害者」（無論是種族、性別、政治）神聖化，左派掀起的革命把他們當棋子來使，以奪取權力。

最有權、最富有、位階最高、能為所欲為的，就成了神祇般的人；其餘的人都淪為次等

的存在，如草芥的奴隸。

（2）在現代邪惡的進步性、複雜性、腐蝕性裡，權力是最主要的因素。現代化的驅動力，與自古以來的黑暗三駕馬車一樣，就是「金錢、色情和權力」。在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中，生命被宣告不值得存活，國家被認為沒有生存權。

較之古代，現代巴別塔祭壇的凶殘尤勝一籌。墮胎工業化每年讓千萬無辜胎兒喪生；性革命蹂躪的人無以計數；共產政權所殺的人超過一億；烏俄戰爭已讓一百萬人喪生。大自然幾乎已被人完全征服，而人性也正在被征服。所謂的「進步」，不單指彌補人身體的缺陷，而是要改變天然人的原貌。每一種所謂對人類有益的「進步」，都可以變成操控人、奴役人、決定某人是否值得存活的工具。

（3）

權力自身有強大的誘惑力——保證擁有者是贏家。現代世界不約而同地肯定兩個毒念：第一，要作人上人的唯一途徑是擁有權力；第二，能與權力抗爭的唯一辦法，是得到權力——無論



用什麼方法。權力政治成為後現代民主社會的新思維。

（4）今天權力與仇恨聯手，危險加倍。就毀滅力和毒害性而言，「仇恨」與「權力」旗鼓相當，可說是雙胞胎。馬克思的革命用「仇恨」毒化了西方，已經超過兩百年。如今，「怪罪」和「怨恨」成了西方左派的基本美德。從前十誡定罪的「貪婪」，現今成為

資本主義的必要品德，以刺激消費主義；共產主義則用它來點燃階級怒火，藉此推翻所謂的「不公」。

(5) 權力是自由的挑戰，攸關其生死。從終極而言，「自由」和「權力」是完全對立的。「權力若不擴張，就會消亡」；而「自由若不自我限制，就會消亡」。沒有限制的權利，等同於沒有原則的權力，是自由最大的敵人。

美國的核心價值是自由。現代世界既以權力至上為原則，就與美國「有序自由」的核心原則全然對立。因為，要能有自由，就必須對權力加以限制，而且要把權力分開。自由的精神乃是不倚靠權力；靠說服而不靠強制。

過去的羅馬劇院、巴比倫神塔、埃及金字塔、中國長城，無一不是世界奇觀，但也全都是驕傲、極權的君主用大批奴隸所建。如今擁有現代科技的極權大國，必會有更宏偉的建設。美國是否明白，這種在「前基督教」與「後基督教」時代盛行的、肆無忌憚的權力意識形態，會給人類帶來怎樣的災難？

可惜大部分美國人對這一點毫無警覺。現今，美國之外的世界有超級獨裁者，美國內部又有超級富豪、超級名人、強人領袖。「有序的自由」是否仍為美國政治的主導理念？

美國衰落的現況

面對權力的巨人主義，美國「在神之下的國家」的宣告不應該是句空洞的口號。確信有「獨一真神」的信念，乃是一種至高、至強的權威，讓人敢於去約束菁英階層的傲慢，限制以人為神，不容機器橫行，以致人類與自由的無比價值得以存續。

然而，今天的美國人幾乎已把建國元老要永保自由



的理想置於腦後。許多美國人以為，雖然上帝「死了」，但一切仍能如常；美國的自由和偉大也可以世世代代延續下去。但這種樂觀的無神論者忘了：沒有根的花必定會凋謝。歐洲文明拒絕了基督信仰，不久之後就退化成野蠻的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

2023年9月，紐約時報有一天的頭條為：「美國是正在衰落的帝國；這並不意味它必定會倒。」美國的衰落，不是指國會山莊的荒廢，而是指美國的「共和」（依法治理的立約模式）已不再如高舉的火把，從遠處可以望見。美國的「共和」或許會消逝，只剩下空洞的言辭；不過美國的「民主」（多數治理）可能壽命還會長些。而即使民主也消失殆盡，美國這個現代強國仍不一定會馬上殞落，但是毫無光明可期。

人的智慧在於有自知之明。智者當知道自己的本像、所處的情況，並負責而勇敢地去回應。身為自由社會的公民更應如此，因為自由社會是很少有的，而能持久的自由社會更是少之又少。美國要警覺：國家的退化已經開始；若不把握時機加以扭轉，保住自由，未來委實堪憂。

決定論 vs. 自由

古人以為，人的一生由命運控制，如東方的輪迴、巴比倫的星象、希臘人的命運與宿命；人並無自由可言。現代仍有決定論之說，「歷史的必然論」正大行其道。這種決定論，對馬克思而言是經濟，對弗洛伊德是心理，

對賈克·莫諾是化學，對道金斯是基因。偶然與必然主導一切。我們別無選擇，毫無自由可言，總是被註定了的。人想要自由，不過是種幻想。如果科學顯示，每件事都是被決定



的，那麼，謊言、欺騙、淫行都是必然的，無可責怪。決定論可以解釋一切，讓一切都有藉口。

在這一點上，基於猶太教的基督信仰則與古代和現代人的思想截然不同。聖經講述：自由的神按造祂的形像與樣式，造了自由的人，要他們認識祂，自由地活在祂面前，也自由地相處。人是既有自由，又有命定。這是人類自由信念的堅固根基。

自由也意味著責任。因此，自由是有後果的；濫用自由去行惡，就會有惡果。若是揮霍自由，則會失去自由——可能是逐漸的，也可能突然發生。任意使用自由，最終可能會落入捆綁——或是思想鑽入牛角尖，或行為上癮，以致完全失去自由。

自由本身並不會永存。自由的前提是一些原則；如果這些原則被忽視或忤逆，自由就不會長存。真正且長存的自由，是一種道德成就。而就像彈琴或運動一樣，自由也需要練習、紀律和堅持。另一方面，一旦自由失去了，或有失去的危險，重新善用自由帶來更新，總是可能的。

只要讀過聖經的人就會明白：「衰落與消亡」，不是歷史的必然搭配。聖經描述的另一種搭配是：「流亡與歸回」。疏離可以迎來和好，失落可以至終歸家。這不是因為決定論，

而是因為「自由」讓人可以犯錯，也可以回頭。

在美國開始衰落之際，從聖經而來的自由觀足能提供真正回轉與復興的可能。因為在「悔改」或回轉的最後一刻，全靠「自由」來作出選擇。

復興有可能嗎？

「信仰和有信仰的人，是瞭解自由與國家復興的重要組成」，今天許多美國人可能對這個說法不以為然。主張世俗主義或物質主義的人，會認為這是政治不正確，可笑至極。但凡是認真思考的人，都會清楚看到：除了聖經的信仰之外，世上沒有一種邏輯或理想能成為自由或復興的根基。

若把美國所有的問題都攤出來，便可以看清：要有真正的復興，必須作出全面而徹底的改變。一次演講、一道命令，有如杯水車薪；空洞的講公民原則不夠，重編教學課程也無法點燃復興。美國的首要原則、真理、信任等需要全面恢復；而基石則是信仰與靈性的復興。唯有強勁鮮活的基督信仰，信徒將靈性願景及真理充分彰顯出來，才有勝過極權主義和權力鐵律的力量。

以色列民的歷史充滿從滅亡邊緣到再度復興的神蹟。基督徒的歷史也屢次出現衰退、腐

敗、背道，然後是復甦、復興、覺醒。十八世紀初的英國，與對岸被革命蹂躪的法國幾無二致：政治腐敗，民生潦倒，風氣頹廢，皇室招怨。許多人都以為英國必然步上法國的後塵。然而1739年第一次大覺醒臨到，靈性復興在大西洋兩岸蔓延開來，改變了整個英語世界，而且持續了一百多年。

未來美國會否出現這樣的復興？沒有人能預知。既然人有選擇的餘地，未來就是開放的。美國的明天，要看今天的人怎樣回應當前的挑戰與警告。

在250年國慶時，若要「讓美國再次偉大」，需要有足夠多的美國人看清楚，美國這個偉大的自由實驗已經脫了節，走了岔路；必須盡全力去恢復。

對慶祝250年的五個建議

在美國慶祝250年國慶時，以下的五個建議有助於團結人心，歸回追求自由的正途。

(1) 領袖的喊話。領袖階層要向全國講話，描述現今的實況，列出美國必須作的抉擇：美國人是否要屈服於1789年法國革命的理念，並繼承它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要回歸1776年美國革命先祖的理想，成為世上真自由的繼承人？

(2) 認罪。美國必須要作真誠的自省，帶著悔改、認罪的態度，離棄罪惡、偽善、失敗，並一切與建國理想相悖的事。沒有對付的罪就像戰爭留下的隱藏地雷一般，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傷害。美國曾經廢奴、爭取民權，但仍有歷史上未處理的傷口，否則激進的左派就不會有找碴的理由。唯有坦白承認、願意補救、下定決心，才能帶來真實的醫治。

(3) 約的更新。必須有大批美國人真正重新獻身，為美國首要的原則而活；就像以色列在歷史中曾多次與神重新立約一樣。自由是生發於人內心的。美國人必需回答：美國人是否還有爭取、維繫自由之心？倘若沒有，自由的社會就不再能興盛、持久。

(4) 國家重獻。國慶的高潮可以是在2026年選一天作為全國重獻日。在這一天，領袖們在華盛頓首府舉行莊嚴的儀式，全國各地的城鎮也舉辦類似的活動。儀式有慶祝、感

恩、認罪與重新奉獻。此舉或許能為過去五十年美國文化受到的傷害帶來醫治。

(5) 成立自由與公義工作隊。250年的美國國慶可以是一個機會，成立一個類似甘迺迪總統時代的「和平工作隊」(Peace Corp)，或許可命名為「自由與和平工作隊」，來促進國家的合一，重燃國家的願景。真正的重建需要新一代年輕的美國人興起，負起責任，攜手合作，來恢復美國實驗的應許。

最後最好的機會

林肯總統曾在南北戰爭之後給國會寫信，提到美國是「地上最後最好的盼望」。如今，在美國建國250週年之際，所引發的檢討與展望，很可能是最後最好盼望的最後最好盼望。這個時機必須抓住。美國需要有願景的領導人，指出美國公民必須作出的重大選擇。正如摩西當年向以色列民說：「我今日……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三十19)。

2026年是美國的一個機會，呼籲全國公民同心，止住國家的下滑和失敗，帶來復興。美國的時間已經不多。正如美國著名的自由鐘裂痕已深，同樣，美國原初自由與共和的理想受到的損毀也非常明顯。但願美國立國當年自由鐘傳出的信息：「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利二十五10)，在美國建國250週年時，也能再度響遍各地。🇺🇸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專題

戰火中的中國教會

《追尋和平的國度》選讀



面對戰爭， 基督徒應有的警覺

陳宗清

摘要：本文為《追尋和平的國度》一書的序；反思人類因罪陷入戰爭，探討聖經對戰爭與和平的教導，特別關注台海局勢與民族主義挑戰，強調基督徒應超越政治立場，以神國為先，盼望基督帶來終極和平。

Abstract: This article, written as the

preface to *Pursuing the Kingdom of Peace*, reflects on humanity's fall into war through sin and examines the Bible's teaching on war and peace. In light of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challenges of nationalism, it urges Christians to move beyond political allegiances,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place their hope in Christ, who alone brings ultimate peace.

人類普遍渴望和平的來臨，然而歷史的長廊卻不斷傳出戰爭帶來的哀鳴與悔怨。黑格爾曾說：「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因此，面對過去的戰爭，人總是重蹈覆轍，重演悲劇。

當罪進入了世界，人類就無法避免戰爭的發生。根據《聖經》，從出埃及記到約書亞記，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戰役超過十場，而這些戰爭大部分是神主導或容許的，為了成就祂的計劃。在人類歷史中，神使用「戰爭」作為審判與警戒的工具。有人統計，主前1496年至主後1861年之間，全地沒有硝煙僅227年，而其間的3130年總有地域被戰火蹂躪。

在戰爭與和平的倫理議題上，奧古斯丁是第一位提出「公義戰爭」概念的神學家。這概念由兩個要素所組成：第一，參與或發動戰爭是合宜的（*jus ad bellum*）；第二，在戰爭中的行動是正義的（*jus in bello*）。納粹政權在1933年奪取德國的統治權時，要求教會要順應國家社會主義。換言之，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試圖要主宰政教關係的走向。1934年5月，以卡爾·巴特為首的一些具影響力的神學家，包括馬丁尼莫拉、潘霍華等，共同發起「巴門宣言」，譴責這種持混合主義的官方教會為異端。

華人世界對於戰爭並不陌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有一些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國共戰爭的人存活。1949年之後，台海兩岸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未消滅。過去十年，許多國際政治專家認為，台灣海峽是全球最容易開戰的地點之一，這種判斷並非空穴來風。

面對中共政權可能武力犯台的現狀，台灣民眾的反應並不一致。由於政治理念及對民族主義認同的分歧，島上百姓的主張從「頑強誓死對抗」，到「企圖尋求和解」、「願意和平歸順」、「極力促成統一」等皆有，差異不可謂不大。

對於這個攸關生存危機的問題，台灣的基督徒中間也呈現多樣化的聲音和看法。因此戰爭一旦發生，教會的牧者很難掌握清晰而沒有破綻的神學範式，去牧養各種不同的會眾。屆時大陸的教會（包括三自及家庭教會）信徒或許也會因政治環境的壓力，而不得不表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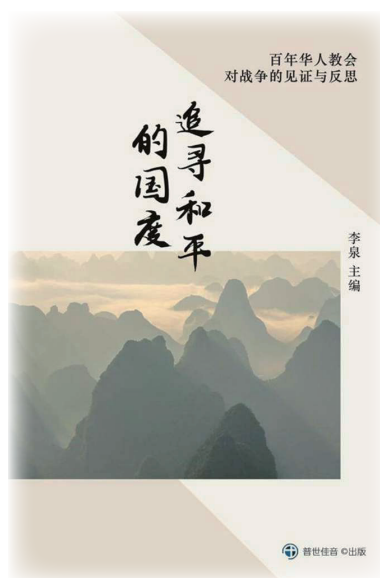
我們所敬拜的神大過一切政治理論，祂的

國度凌駕任何地上有限的國家。標榜國族主義的思維從不應成為信徒對政治看法的指南。因此，根據《聖經》，「中國民族主義」及「台灣民族主義」都是極危險且錯誤的觀念。

面對錯綜複雜的戰爭倫理課題，我們不僅要慎思明辨，更需要迫切禱告。原則上，追求和平是基督徒在面對軍事衝突時應秉持的態度。除非我們確信「某些戰爭」是神所允許的，為了要成就祂至高奇妙的旨意。

以賽亞書第九章預言彌賽亞來到人間，他要被稱為「和平之君」。由此可見，在神的心意裡是要人類遠離爭戰。以賽亞書第十一章描寫未來和平的景象：「豺狼必與綿羊同居，……」以賽亞書二章4節描述，未來人間會「將刀打成犁頭……」當年所羅門在以色列國登基後，神使列國不來侵擾，以至所羅門能享受四圍安靖的局勢。擾亂人類和平的根源其實是人的罪，所以，除非基督在人間掌權，否則永久的和平便無法實現。

李泉博士主編的《追尋和平的國度：百年



華人教會對戰爭的見證與反思》

（普世佳音，2026），邀請六位華人基督徒學者參與。過去兩年，他費盡心思建構此書內容，並與各個作者頻繁溝通，達成共識，才能有如今的成果。書中剖析過去一百年教會所經歷的戰亂，客觀闡述當時的教會領袖如何回應戰事。這些領袖常面臨去向的選擇，而他們除了考慮家庭及教會的需要之外，也受個人神學思想的影響。這些學者研究所得的結論，值得華人教會省思，且引以為鑒。願主使用此書，在華人基督徒中間引起重視，讓成千上萬的人可以受益。✚

的國度

作者為恩福會長，本刊主編。

末後必有之事

約書亞

摘要：作為主的百姓，如何在「戰爭」與「戰爭風聲」的當下，預備好自己，以愛鄰舍之心見證基督的福音，擔當基督託付給教會每一位門徒的大使命，是每一個世代主的百姓都需要禱告、預備和思考的問題。

Abstract: In times marked not only by war itself but also by the rumors of war, how are the Lord's people to prepare themselves? As those who belong to Christ, we are called to consider how to bear faithful witness to the gospel with

love for our neighbors, even amid uncertainty and upheaval. How do we remain steadfast, cultivate spiritual readiness, and discern our calling in such times? How do we embrace the Great Commission entrusted by Christ to every disciple and to his Church?

These are not questions unique to our generation. They are matters that the Lord's people in every age must prayerfully reflect on, wrestle with, and prepare for.

2016年5月，我從美國回到中國，開始植堂建立教會。2022年8月疫情防控結束前，我正經歷第一個七年的教會服事週期，身心俱疲，期待藉著旅行，探尋歷史足跡，尋求神在這個世代的心意，從而重獲靈性的安息與力量的復原。

安息假期間，我安排了在歐洲、美洲多地旅行，藉此機會與來自大陸、台灣等地的不少基督徒牧者及學者交流，其中一個議題便是對兩岸關係前景的擔憂。

在土耳其以弗所教會使徒約翰的墓地，我與一位亞美尼亞牧師交流，從烏克蘭戰事談起，他竟直接提出中國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這讓我當時感慨頗多；在羅馬城的地下墓地，與接待我的華人長老交流時，他也提到中國經濟、政治似乎在為戰爭做準備；在洛杉磯、紐約，幾次與來自台灣、香港的學者及牧者交流，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及台海戰事以及應對之策。

作為一名家庭教會的牧者，我深知國內教會尚顯稚嫩，存在不足。若發生戰爭，那不僅是同胞的災難，也將是教會的災難。回國後，我為此多次禱告、尋求主的指引，回想與台灣長輩及弟兄姊妹交往的點點滴滴，我深知兩岸基督徒之間，不僅有同胞之情，更有靈胞之誼。

正如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所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基於此信念，我與

教會長老進行了交流，準備奉獻以支持這一研究課題。其時，我與安平牧師正在籌備成立「漢語公共神學學會」。戰爭威脅如房間裡的大象，非直面不可。我與安平牧師多次禱告和交流，邀請李泉兄召集兩岸的菁英學者，在學會正式成立之前即先行啟動此課題，並於2024年7月首屆漢語公共神學年會設置工作坊，討論確立作者分工與文稿大綱。經團隊兩年多的深入思考與研究，得以完成《追尋和平的國度》這部佳作。感謝上主的恩典，願主使用這部作品，榮耀祂的名，祝福祂的百姓，祝福天下蒼生，願兩岸和平！

自古以來，關於戰爭的論述浩如煙海，其中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阿奎那和格勞秀斯對正義戰爭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他們認為，正義戰爭必須符合自然法，即超越各國成文法的普世正義觀念，如天賦人權和財產保護等。這一觀點將上帝授命下的人類必須承受的戰爭與那些沒有上帝授命、應當避免的戰爭進行了明確區分。

儘管世俗政權發起的戰爭中，許多並非出於正義，而是出於國家利益與個人野心，但上帝的主權和掌管仍然高於這一切。歷史上，上帝曾使用埃及、巴比倫和波斯等帝國來實現其救贖計劃。

當今世代的戰爭與古時一樣，依然是人性中充滿「各種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作『陰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

詐、毒恨……」（羅一29～32）的自然彰顯與表達。無論是在和平還是戰爭的環境中，人類的明爭暗鬥如同不息的江河。研究戰爭與和平的課題，不應僅僅是對時事政治的應急反應，而應更廣泛和長遠地關注與思考這一問題。

「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可十三7）。這段經文的平行經文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6節中也有記載，內容均在講述末世代之前的狀況。打仗（πολέμους）是複數 wars，經文中明顯是指「正在進行的多場戰爭」。「打仗的風聲（ἄκοαίς）」是指打仗的「流言」（rumors），或者即將打仗的「傳聞」。

接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繼續提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這裡更進一步指出，類似「生產之難」的戰爭、地震和饑荒並不是最後的災難，而只是個開始。

耶穌基督的這段末世論預言，在神學界雖有不同的闡述角度，但關於人類「戰爭」的解釋卻相當一致。自人類始祖犯罪被逐出伊甸園後，到耶穌基督再來之前，人類之間的戰爭是一種客觀的、無法完全避免的現象。

回顧中華文明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儘管無法精確統計戰爭與和平的具體時間，但總體而言，戰爭的時間遠遠多於和平的時間。受激進主義思潮的影響，自1949年共產政權建立以來，華語族群內部的大規模戰爭表面上似乎暫停。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一方面，隨著俄烏戰爭的持續和中東多場戰爭的進行，戰後國際秩序趨向分化與瓦解；另一方面，國際政治的右轉與逆全球化趨勢，加上國內意識形態的左轉與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台海兩岸發生戰爭的風險明顯上升，兩岸同胞面臨著非常真實的戰爭威脅。

一些學者認為，俄烏戰爭中俄方的表現與歐洲各國支持烏克蘭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可能阻止台海戰爭的爆發；也有學者認為，美台

之間的某種戰略聯合會阻止台海戰爭的發生；還有學者認為，由於大陸經濟不景氣，政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戰爭不可能發生。

當然，這些都是合理的思考。然而，歷史上許多戰爭的爆發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領導人的個人意志、政治突發事件、轉移國內矛盾的意圖等，都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

對於基督徒而言，我們知道全能的上帝對歷史的進程擁有真正的主權，祂廢王立王，掌管人類的戰爭與和平。儘管基督教信仰在主流華人文化中處於邊緣地位，餘民神學對此並不排斥，甚至自足於這一狀態，但基督教信仰本身的大公性，不僅體現在教會的普遍性、全體性和在基督裡的合一性，也體現在其國度視野中的使命性。

這種使命包含對所有未信之民命運的關愛與擔當。這種關愛與擔當體現在亞伯拉罕為所多瑪和蛾摩拉的代求（創十八16～33），但以理為巴比倫哲士和術士命運的擔當（但二18），以及耶穌基督希望萬人得救的心意（彼後三9）。

戰爭是殘酷的，個體在其中顯得極其渺小，甚至微不足道。所謂「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每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作為主的百姓，如何在「戰爭」與「戰爭風聲」的當下，預備好自己，以愛鄰舍之心見證基督的福音，擔當基督託付給教會每一位門徒的大使命，是每一個世代主的百姓都需要禱告、預備和思考的問題。

正如約翰·衛斯理所提到的「世界牧區」概念，基督徒並非孤島，研究華人世界的戰爭問題既是世界之人的事，也是教會理所應當思考的事情。

對於本書《追尋和平的國度》，我前前後後讀了不下五遍。作者都是受過嚴謹學術訓練的學者，也有學者型的牧者。每篇報告的文筆嚴謹，使用定性和定量的不同研究方法，內容涵蓋神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雖然作者來自不同的背景，但把每篇研究文章連在一起都能看到各位老師對教



會和兩岸同胞深深的愛與關切。

本書不僅適合教會的牧者、長老、執事或教會同工閱讀，也適合每一位蒙恩得救、關心同胞命運的弟兄姊妹閱讀。眾所周知，學海無涯，各有所專，而戰爭與和平的研究又較為廣闊與繁雜，研究者也不太可能面面俱到，但書中研究的都是比較重要且實際的問題，盼望藉

著本研究激起學術界及教牧界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關注。

最後感恩在全書研究、審定之中付出時間與精力的每一位老師，願榮耀和頌讚歸給三一真神。✚

作者為恩福宣教拓展主任。

抗戰和內戰時期，中國學生復興運動

孫澤汐

摘要：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基督教學生群體經歷了一場意義深遠的信仰復興運動。在戰爭造成的社會動盪與大規模人口流動中，內地會宣教士與趙君影等領袖人物攜手合作，以英語查經班、校園團契和全國性學生大會為主要方式，在大學生中激發了一場屬靈覺醒。這場運動不僅在戰時培養了大批忠心的基督徒學生，更在戰後對中國家庭教會的興起及全球華人教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面對當代的不確定局勢，這段歷史為華人教會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Abstrac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Christian students in China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spiritual

revival. Amid the social upheaval and massive displacement caused by war, missionaries from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joined hands with Chinese leaders such as Calvin Chao, employing English Bible classes, campus fellowships, and 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s to ignite a spiritual awaken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movement not only nurtured a generation of committed Christian students during wartime, but also shaped the rise of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urches worldwide. As Chinese churches today face renewed uncertainties, this history offers invaluable lessons for faithful witness in turbulent times.

戰爭催生的屬靈覺醒

1937年盧溝橋事變引發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了長達八年的空前苦難，也帶來了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據估計，有4000萬至6000萬人因日軍的威脅，拋棄了家園與生計，僅帶著少量財物，踏上了前往中國西部的艱難旅程。這些難民中不乏大學生，他們與其他難民一樣，發現自己生活困頓、前途渺茫。基督教信仰所提供的盼望，對這些面對不確定未來的年輕人顯得格外具有吸引力。

民國時期的大學生多來自城市的中上層家庭，1931年大學生僅佔總人口的0.01%。這些菁英青年深受儒家傳統與西方思潮的雙重影響，視自己為中國未來的領袖，深感有責任參與家國事務。戰爭打破了高等教育的貴族化格

局——國民政府推行戰時學生貸金和公費生政策，大學入學率在戰時翻了一番。內遷的大學多集中在西部的昆明、重慶和貴陽等城市，大批青年湧入後方高校，也為基督教的學生事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從英語查經班到校園團契

自十九世紀以來，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CIM）的宣教重心一直在中國農村。然而，1939年1月2日，內地會在上海的理事會上作出了一個關鍵的戰略調整：將學生事工列為重要工作方向。內地會中國總監華福蘭（Frank Houghton, 1894 - 1972）在1941年的報告中指出，國立大學不僅對宣教士的到來表示歡迎，甚至邀請他們教授英語，儘管校方明知其最終目的是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至1942年4月，已有至少八位宣教士積極投身於學生事工，分佈

在蘭州、陝西城固、貴州安順、四川和河南等地。

宣教士們採取了一種獨特而有效的方法——開設英語查經班。孔保羅（Paul A. Contento, 1905 – 1997）在報告中介紹了他在城固的經歷：「去年8月，我們看到數百名剛剛結束軍訓的學生在街上閒逛，顯然無所事事。經過詳細了解，我們得知他們的大學要兩個月後才開學。於是我們立即張貼通知，開設英語課程。第一天就有三十多人報名，我們喜出望外！」三個月內，孔保羅便組織了據稱是亞洲及中國第一個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賴恩融（Leslie T. Lyall, 1905 – 1996）在貴陽也有類似的經歷，越來越多的學生前來聽課，一些學生希望與他單獨交談和禱告。

與傳統奮興佈道會不同，內地會的宣教士不依賴講台佈道，而更傾向於採用討論形式，歡迎非基督徒提出知識性問題，強調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而不僅僅是訴諸情感。這種方法引起了大學生的共鳴。一位年輕男子，是醫生和醫學院教授的兒子，和許多受過科學訓練的人一樣，他從小就是一名無神論者，相信科學與宗教不可調和。然而，戰爭的爆發和父親的去世，迫使他與學校一起逃往內陸。當學校在昆明安頓下來後，他和幾位同學找到了一位宣教士學習《聖經》。幾週後，這些學生說道：「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對基督教的合理解釋。現在我們可以成為基督徒了，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信的是什麼。」他們邀請同學一起見證洗禮，並在座無虛席的觀眾面前，每個人都陳述了自己信仰的理由。事實證明，在社會劇烈動盪時期，結合嚴謹的知識探討與個人的屬靈經歷，是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中傳播基督教的有效方式。

全國性運動的興起與高峰

校園中的小組查經班奠定了歸信的基礎，而奮興會則進一步推動學生委身跟隨基督。趙

君影（Calvin Chao, 1906 – 1996）的參與，標誌著學生復興運動進入了全國性組織的新階段。趙君影出生在南京，父親鴉片成癮，母親在他六歲時去世。他在教會學校長大，後考入杭州的基督教之江大學。畢業前三個月患上肺結核，三年後在計志文帶領的伯特利佈道團的奮興會上獻身侍奉。1938年冬，他來到昆明，寫道：「一九三八年冬，我到昆明後，立即向西南聯大的學生作見證，內地會的孔保羅牧師和師母，也同時開始學生工作。在我的記憶裡，這是我個人在抗戰時期，首次開始大量地向青年人傳揚福音，我也相信在內地的多處，同時也有類似的學生工作萌芽。」趙君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講道風格，能夠通過哲學框架闡述聖經信仰，深受學生們的歡迎。

1945年夏天在重慶舉行的學生大會促成了中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學聯）的成立。來自40所大學的169名代表參加了這次為期十天的會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福音派大學生大會。趙君影被選為總幹事。

1946年，內地會宣教士艾得理（David Adeney, 1911 – 1994）通過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從印度前往重慶，加入學聯擔任副總幹事。他與趙君影及于力工密切合作，走遍各大學校園，幫助建立團契小組，進行門徒訓練。他驚訝地發現，新的基督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回憶道：「我永遠記得參觀一所戰時臨時安置在鄉下的大型大學的情景。基督徒中爆發了復興運動。我們還沒到就聽說了。連鎮子前面河上的小渡船船夫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學生們來了，給了他們錢，彌補使用偽造船票的損失。教職員工也感受到了變化，因為學生們承認在考試中作弊。」

1947年學聯舉辦的第二屆全國基督徒大學生夏令會，是這一運動的巔峰。地點設在南京中山陵內的烈士遺族學校，賴恩融形容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盛大的福音派學生會議。來自全國約100所大學的近350名學生代表出席。大會



主席由大學生焦源濂擔任，講員包括趙君影、楊紹唐、計志文、賈玉銘，以及包括華福蘭在內的幾位外國宣教士。蔣夫人宋美齡也出席了會議，並帶來了總統的鼓勵。此時，全國基督徒的比例僅為1/400，但每15個大學生中就有一位參與學聯，足見這場運動影響之深。

運動的終結與深遠遺產

1949年，隨著國民黨潰敗，中共建立新政權。新政府對大學的意識形態忠誠度要求甚高，大學生被要求放棄一切宗教信仰。他們被迫參加破除舊思想的學習小組，不僅要自我批評，還要接受同伴的批評。由於宗教被視為反動的象徵，基督徒學生常常成為攻擊目標。政府禁止在指定教堂以外的場所進行任何宗教活動，許多學生仍珍視團契，秘密繼續小組聚會，然而許多人因此遭到逮捕，隨後被投入監獄或勞改營。到1951年5月，內地會宣教士被迫撤離，學聯被政府正式解散。

表面上看，這場學生運動似乎已被根除。然而，學聯及其代表的基督教學生運動在文革後的家庭教會興起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夏令會上獻身的近百位傳道人中，多人正如邊雲波在《獻給無名的傳道者》一書中描述的那樣，把福音帶到了西北地方。運動的影響更遠及海外：北京團契的成員查逸錕（David Zha, 1924 - 2011）移居台灣，成立了台灣校園團契。到二十世紀60年代，艾得理繼續在香港的學生中開展工作，成立了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培養了許多教會領袖、學者和神學家，如李思敬、梁家麟、蘇穎智等。

歷史反思與現實意義

回顧這段歷史，有幾個方面值得當代華語教會深思。首先，戰爭帶來的社會動蕩雖是災難，卻也可能成為信仰復興的催化劑。這場運動的成功在於找到了適切的事工策略——英語查經班、小組查經、校園團契與全國性組織相結合，形成了一套靈活而有效的福音網絡。宣教士尊重學生的理性需求，以討論取代獨白，以合理性回應質疑。在當今時代，教會同樣需要發展兼顧理性思考和屬靈經驗的事工模式。

其次，教會在與政權互動時需要保持獨立和謹慎，同時不失去社會責任。趙君影與國民政府官員的密切關係雖為運動提供了聲望和資源，卻在政權更迭後使學聯的處境更加複雜。學聯的非政治立場為他們提供了獨特的見證機會，然而，當全面的意識形態壓力來臨時，單純的政治中立並不足以應對挑戰。通過清晰的神學教導和入世而不入世俗的社會參與，教會可以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堅守信仰，成為基督在世上的見證。

幾十年後回望這次群體的屬靈邂逅，艾得理不無感傷地感慨道：「只有永恒才能揭示那場夏季會議對學生們意味著什麼，以及這些學生為他們在那裡作出的承諾承受了多少苦難。」面對複雜的政治、社會與意識形態挑戰，教會應保持靈活性和獨立性，不倚賴政權的支持，在動盪中堅定地傳揚福音。當代華語教會應反思這些寶貴的歷史經驗，為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在社會的變動中堅守信仰的獨特性，積極成為基督有力的見證。✚

作者現任美國田納西州貝爾蒙特大學基督教歷史助理教授。

冷戰下的基督教民主敘事

柏雨成

冷戰與基督教民主敘事

冷戰不僅塑造國家，也塑造了教會的思想活動。本文關注一個在部分華人教會中長期流行的說法，即美國民主制度的成功，得益於美國深厚的基督教背景；更具體地說，清教徒與加爾文主義是美國建國時的核心基督教思想，甚至是美式自由民主唯一的精神源頭。近年華

人基督教媒體對美國政治的討論，也顯示這種敘事確有其市場。

本文的核心主張是，將基督教（尤其保守加爾文主義）與美式民主高度綁定的敘事，在華人教會中的成形與傳播，很大程度上是冷戰的產物。美國教會，包括改革宗教會，參與美國政治自由由來已久。但把「民主自由的

摘要：本文追溯一種在華人教會頗流行的說法：基督教（尤清教徒/加爾文主義）傳統是美式民主自由得以施行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根基。本文主張：這種「清教徒/改革宗—美式自由」的強綁定敘事，並非自然長成，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政治壓力下形成、傳播並被重塑的產物。通過兩位影響深遠的華人宣教士/神學傳播者——趙中輝與趙天恩——本文展示這一敘事如何在冷戰不同階段進入並改變華人教會公共神學想象，並反思其對「新冷戰」語境下教會的教牧意義。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popular claim within some Chinese churches: that Christianity—especially the Puritan and Calvinist tradition—served as the primary,

or even exclusive, founda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and liberty. It argues that this tightly bound “Puritan/Reformed–American freedom” narrative did not emerge naturally, but was largely shaped, disseminated, and reconfigured under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of the Cold War.

Focusing on two influential Chinese Christian figures and theological mediators, Zhao Zhonghui and Zhao Tian'en, the article traces how this narrative entered and reshaped the public theological imagination of Chinese churche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old War. It also reflects on the pastoral implications of this legacy in light of a possible “new Cold War.”

源頭」幾乎單線歸因於改革宗傳統，並把這種歸因作為公共神學的核心框架，則與冷戰時期的政治壓力密切相關。本文以兩位影響深遠的華人宣教士與神學傳播者——趙中輝與趙天恩——為線索，追溯這套敘事進入華人教會的路徑，並觀察其在冷戰不同階段的變形。

北美約老會在冷戰期間的尷尬處境

理解這一點，必須先承認，美國關於「基督教與民主」的關係，本就不是單一傳統。學者們指出，美國建國思想本身是多源匯流，包括古典共和主義、英國普通法與輝格傳統、啟蒙理性主義，以及清教徒聖約神學等都參與其中。基督教確實提供了重要資源，但它與其他思想元素交織融合，難以被壓縮為單一來源。¹

與此同時，美國改革宗傳統內部也並非一致擁抱民主制度。北美約老會（Reformed Presbyterians of North America）便代表一種長期對美國憲政秩序保持距離的邊緣改革宗立場。他們繼承部分早期改革宗政教觀，認為政府不應在宗教上完全中立，而應公開承認基督教的公共地位。他們曾推動「基督教修憲運動」，試圖在憲法中加入認信上帝的語句，甚至主張政府官員應有宗教立場測試。運動失敗後，該宗派內部一度限制會眾投票與參政。由於這種立場，他們在美國長期是小眾。²

小眾身分是一把雙刃劍。北美約老會雖

在政教問題上不合主流，卻因不急於與國家敘事合流，反而在一些重大議題上比較一致地保持了一種先知性的超越態度。他們較一致地批評奴隸制、排華法案以及美國對有色人種的不公，也曾抨擊鴉片戰爭與鴉片貿易。在宣教語境中，正是在這種「邊緣—先知」的宗派傳統裡，他們仍投入來華宣教，並影響到後來華語改革宗神學傳播的關鍵人物趙中輝。

趙中輝1916年出生於遼寧，十九歲在王明道佈道會中信主。早年他受前千禧年時代論影響，後來卻逐漸認為這種傾向「逃離現世」的神學不足以回應現實處境。他在東北營口聖經學院接觸到北美約老會宣教士魏思道（Johannes Geerhardus Vos）與包義森（Samuel Boyle）等人。國共內戰期間，他一家在戰亂中輾轉南遷，後經香港、日本，最終定居美國。1948年，趙中輝與包義森等在香港創辦改革宗翻譯社（RTF），成為華語改革宗文獻傳播的重要管道。³

冷戰的成形很快改變了神學傳播的環境。50年代初，宣教界對中共態度分化：有人同情民族主義或社會改革，有人謹慎觀望，也有人將共產主義視為魔鬼勢力，必須決裂。冷戰由此塑造一種二元心理結構：複雜議題被壓縮為「上帝與魔鬼」的鬥爭，而教會被迫在兩極中迅速站隊。

對北美約老會而言，這種站隊並不輕鬆。

它在冷戰前長期批評美國憲政中的宗教中立與信仰自由原則，甚至保留較早期的《西敏斯特信經》版本，不接受後來美國長老會強調宗教自由的修訂。如今要在反共立場上支持美國與西方，它必須解決一個神學張力，即如何既要肯定美式自由民主優於共產極權，又不能顯得自己背棄了過去基於保守改革宗神學對民主制度的批評。於是，一個有效的策略便是塑造一種歷史敘事，一方面肯定美國民主自由的價值，以對抗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堅持這些價值的真正或唯一的源頭並非啟蒙運動或文藝復興傳統等，而是保守改革宗信仰本身。如此，支持美國就不再是政治妥協，而是對「真正基督教文明」的忠誠。



改革宗翻譯社的出版實踐，正體現了這種敘事工程。伯特納《基督教預定論》英文初版於1932年，本是為預定論辯護，但它在華語世界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它的歷史敘事。1954年RTF翻譯並出版了此書的中文版。《預定論》明確宣稱，美國民主政體源於基督教，而這個基督教就是加爾文主義；獨立戰爭主要由加爾文主義者推動；凡接受加爾文主義的民族也會趨向民主共和；長老會制度與代議民主高度相似，甚至互為因果。與此同時，書中往往以排他方式處理其他重要思想傳統。古典共和主義、人文主義、啟蒙的貢獻被淡化，天主教與阿民念主義則常被描繪為君主制與貴族政治的同盟。其結果是把複雜思想史壓縮成單線敘事，而加爾文主義幾乎成為民主自由的唯一起源。⁴

這種敘事並非毫無歷史根據。改革宗群體在近代歐洲確曾在政治迫害中為公民自由原則付出代價。英國內戰時期的宗教語言也影響共和主義傳統，美國獨立運動亦從改革宗傳統中汲取了思想和人力資源。⁵但問題在於，伯特納式敘事更像一種動員性的冷戰歷史。它追求快速劃線與陣營正當化，而非解釋多源傳統如何真實交織。它尤其適合一個原本對美國政治保持距離，在冷戰壓力下突然需要公開「支持美國」，並需要一套能在華語世界迅速複製傳

播的小眾宗派。

冷戰緩和時期 基督教民主敘事的轉型

冷戰後期，這種敘事開始被重新塑形。70年代末改革開放啟動，中美關係緩和，海外教會與大陸尤其家庭教會重新建立聯繫，神學與靈修資源大量輸入。在80年代知識界討論現代化與民主自由的氛圍裡，論證基督教對民主與人權的貢獻，也成為一種宣教策略。此時承接北美華人改革宗宣教的重要人物之一，便是趙中輝之子趙天恩。

趙天恩1938年生於東北，童年隨家庭在戰亂中遷移，後定居日本。1958年赴美後，他在神學道路上選擇更寬廣的訓練與視野，並在一些教義安排上呈現更接近福音派的取向。因此，當他在70年代末開始參與對華宣教與出版時，冷戰格局已在轉變，他個人神學氣質也更開放。

趙天恩對「基督教與民主」的敘事明顯比父輩更寬闊。他不再堅持民主自由幾乎單線來自加爾文主義，而更傾向把民主得以維繫的土壤擴展為更廣義的基督教傳統與長期基督化過程：真正發展出民主制度的國家，往往經歷漫長的福音化與基督化。與此同時，在解釋基督教為何有助於人權時，他強調「上帝形像」人論對尊嚴與權利的意義，但也承認西方民主與人權形成有多重來源：希臘羅馬傳統、聖經教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乃至革命傳統都參與其中。福音影響固然居首位，卻不能抹去其他因素。⁶正是在這種敘述裡，改革宗被放回更大的基督教傳統中，而不再被塑造成唯一源頭。

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理論論述中，也體現在文本編輯上。趙中輝早年翻譯穆約翰討論政教關係的文章時，忠實呈現傳統改革宗對「政府權柄來自人民意志」的批評，並稱之為「相反的理論」。趙天恩在80年代再版時則刻意軟化措辭，把尖銳對立改寫為較溫和的描述，使其更適合在大陸宣教與公共討論中傳播。這樣的語言調整並非純粹修辭，而反映出冷戰緩和

期一種更圓潤、更願意承認張力的公共神學姿態。⁷

當然，軟化並不意味著二元敘事消失。趙天恩團隊中仍有人受薛華影響，傾向把改革宗與人文主義絕對對立，甚至把文藝復興視為反基督教。佈道家唐崇榮宣傳的歷史敘事可為一例。⁸於是，冷戰後期的華人改革宗公共神學呈現出一種內在張力：既有複雜化、開放化的努力，也持續存在動員式、對立式的敘事衝動。也因此，今日自稱繼承趙天恩路線的人群中，既可能出現思想成熟、能進行複雜公共神學操練者，也可能出現高舉簡單敵我框架者。

反思與建議

本文並不裁決基督教與民主究竟應如何對應，而是藉此觀察冷戰心態如何塑造教會敘事，並為「新冷戰」時代的教會提供預防性反思。這段歷史至少提醒我們三點。第一，小眾宗派或「分別為聖」的姿態有其先知價值。北美約老會因長期不急於與國家敘事合流，反而更早識別並批評奴隸制、排華與帝國主義等罪惡。教會不必急於把自己與任何政治陣營徹底綁定。第二，「徹底置身事外」也可能反噬。當政治大潮不可迴避時，長期拒絕公共神學操練的教會，往往只能倉促地用粗糙、二元、排他的歷史敘事為站隊辯護，從而讓歷史被工具化。第三，成熟公共神學需要更寬廣的歷史對話。冷戰後期較開放的討論雖常遭非議，卻為更穩健的公共神學打下基礎；和平時期更應提前訓練複雜思考，以免危機來臨時只能靠簡單敘事自保。

冷戰處境並不利於培養廣博、耐心、能承受複雜性的公共神學。戰爭或準戰爭狀態鼓勵快速劃線，把對話當軟弱，把複雜當妥協。

但教會若要在這樣的時代保持屬靈自由，就必須回到十架的邏輯：那是一種拒絕被敵我敘事吞沒的和平，是一種在衝突中仍不把人簡化為符號與工具的愛。或許正是在尚未徹底陷入對抗之前，華人教會更應利用相對和平的空間，建立更成熟的歷史理解與公共神學操練，使未來真正的壓力來臨時，我們不必靠粗糙敘事自保，而能以更誠實、更清醒、更合乎福音的方式作見證。✚

作者為杜克大學宗教系博士，主修世界基督教，現任富勒神學院教會歷史助理教授。

註：

1.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50th anniversary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67)), 47.

2. Gaines M. Foster, *Moral Reconstruction: Christian Lobbyists and the Federal Legislation of Morality, 1865 – 192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22.

3. 趙中輝，《神恩浩大：我與我一家的見證》（臺北：改革宗翻譯社，1985），頁35–40。

4. 洛林·伯特納，《基督教預定論》，趙中輝譯（改革宗翻譯社出版，1954），二十八章。註：筆者因未能獲取此書的紙質版，因此此處引用了線上版，故暫時無法提供頁數。待以後修正。

5. Eric Nelson, *The Hebrew Republic: Jewish Sour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第四章。

6. 趙天恩，「吾土與吾民——中國福音化異象」，中國與教會4.8（1985年8月），3。

7. 穆約翰著，趙中輝譯，「教會與政府的關係」，中國與教會3.5（1984年3月至4月），頁4。

8. 唐崇榮，《從人論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中國福音會出版社，1991），頁73–75。

中共戰時體制與基督教政策

李泉

中共戰時體制的基本特徵

二十世紀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意識形態驅動的革命鬥爭和暴力衝突為顯著特徵，同時強調戰略創新和靈活的制度安排，旨在確保在複雜的衝突中生存並取得勝利。中國共產

黨誕生於二十世紀20年代第一波現代化浪潮期間，受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自詡為引領中華民族走向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新生力量。眾所周知，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紀裡，中共成功擊敗了國民黨和各地軍閥，建立並鞏固了革命

摘要：中共革命戰略的關鍵，是結合游擊戰、根據地建設和統一戰線，逐漸發展而成的戰時體制。在這套策略的指導下，中共逐步完善了針對基督教社群的政策制定，深刻塑造了戰時的政教關係格局。面對這種兼具綜合性、複雜性與高度靈活性的宗教管治模式，華人教會須堅守「和平使者」的呼召，在共同祈禱、分辨與抉擇中，活出耶穌基督所啟示的天國和平倫理。

Abstract: A key fe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was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a wartime

system that combined guerrilla warfare, base-area construction, and the united fro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trategy, the CCP gradually refined its policies toward Christian communities, profoundly shaping pattern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imes of war. In response to this comprehensive, complex, and highly flexible model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Chinese churches are called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ir vocation as peacemakers and, through shared prayer, discernment, and decision-making, embody the kingdom ethic of peace revealed in Jesus Christ.

政權。

歷史學家曾指出，中共推進革命並打破現有國家對權力壟斷的方式，形成了其獨特的革命模式。不同於伊朗革命在一開始就剝奪了舊政權的合法性，也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迅速摧毀舊政權的暴力機器，中共的策略是通過逐步奪取足夠的領土，建立對抗性政權，即根據地。這種策略使中共能夠在局部地區削弱並最終取代現有政權的武力和民意基礎。這種通過逐步擴展控制區域來挑戰和取代現有政權的方式，構成了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的獨特模式。¹

簡言之，中共革命戰略的關鍵，在於將游擊戰、根據地建設和統一戰線有機結合，逐步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戰時體制。游擊戰幫助中共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有效壯大自身軍事力量並打擊敵人。根據地打造出高度靈活和機動的權力中心，成為中共與強大敵人周旋的戰略堡壘。與此同時，中共依靠根據地人民的支持和參與，獲取各種必要的戰爭資源。統一戰線致力在敵佔區及國際領域發展盟友，爭取道義和物質支持，同時分化削弱敵方集團的力量。在這套策略的綜合指導下，中共發展並完善了包括宗教政策、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在內的廣泛政策體系，不僅規範了針對基督教議題和基督教社群的處理方式，而且深刻塑造了戰時的政教關係格局。

戰時體制下的基督教政策

儘管早期中共傾向於仿效蘇聯的做法，將基督教定性為封建迷信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但戰時需要使中共領導人逐漸認識到，反對並消除宗教的任務只能在漫長的過程中實現，而且需要優先考慮更為緊迫的政治目標，例如擊敗強大的軍閥和國民黨。在曲折的革命和鬥爭過程中，中共幹部也越發意識到，宗教問題的處理不僅涉及意識形態，還與群眾問題、民族問題、國際問題相互交織，為此不僅必須根據戰爭的需要適當調整宗教政策，更需要宏觀和長遠的戰略指導，定位基督教政策與其他相關政策之間的配合。

例如在抗戰期間，中共利用敵後空間積極發展壯大自身力量。以延安根據地為中心，中共在華北地區不僅鞏固了對廣大農村地區的控制，還通過實施土地改革和推行群眾路線，建立了強大的戰爭支持體系。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進行了廣泛的游擊活動，破壞了日軍的補給線，並在敵佔區內建立了解放區。在此背景下，中共對基督教的態度變得務實和寬容，不再以反對、限制和打擊為主。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與中國的軍事聯盟使中共意識到基督教在抗日鬥爭中的潛在價值，於是在統一戰線的戰略指導下，逐步調整了對宣教士和本地教會的政策。這種務實的方法促進了基督教組織與中共之間的合作，使得宗教活動與

抗日的總體目標保持一致。

又如，50年代初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對立，以及在隨後冷戰期間與美蘇交惡的處境，使中共領導人堅信仍處於戰爭狀態。為此，中共延續了在抗日戰爭和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統戰策略，同時配合思想改造、群眾路線、控訴整風以及組織鬥爭等革命手段，來處理並解決基督教問題。學者邢福增曾歸納出這一時期黨國推行的主要宗教政策，其中與基督教關係密切的舉措包括：（1）針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五大宗教，以反封建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名義，開展宗教革新運動；（2）建立黨直接領導的宗教管理體制，通過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和愛國宗教團體，實現對宗教社群的一元化管控；以及（3）以宗教內部的地下黨員為領導，並配合政治形勢，發動宗教群體內的群眾運動，以實現改造宗教的目的。²

總而言之，面對二十世紀層出不窮的衝突與鬥爭，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不斷被豐富、擴展並付諸實踐。³ 在鬥爭與團結結合的原則下，中共針對基督教團體與人士形成了吸納、教育、改造、分化與打擊並用的靈活手段。隨著中共對不同信仰與政治取向的教會因勢制宜地採取差異化策略，一套成熟的宗教管控體系逐漸成形；在宗教信仰自由與寬容的宣傳背後，國家始終保持對基督教組織與活動的嚴密管理，並持續對教會進行滲透和遙控。值得警惕的是，這一機制儘管在相對和平時期偶有鬆動，其本質仍延續戰時的政治邏輯，並可能隨著新的戰爭威脅而被迅速強化。

反思與建議

如何回應這一兼具綜合性、複雜性與高度靈活性的戰略，不僅是中國基督教社群亟待釐清的歷史課題，更是當代教會處理政教關係時必須正面面對的難題。筆者認為，不同於中共貫徹始終的鬥爭哲學與敵我意識，基督教會回應上述議題的規範立場，自始至終應當是回

歸成為和平使者的呼召，在共同的禱告、分辨和抉擇中，見證耶穌基督啟示下的天國和平倫理。在此，復活的基督是我們戰勝暴力、與仇敵和解、並邁向更加公正和平未來的保證。正如主耶穌向門徒們所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二十八18）。

百年來的政治教訓提醒我們，當教會和信徒將注意力過多集中在教會的生存與發展、合法的法律地位，以及國家賦予的宗教自由權利上時，往往會忽略其真正的焦點應當是主耶穌的受難、復活和宣告所啟示的和平的天國倫理。主耶穌從未應許教會的和平，但卻差派門徒去傳揚和平的福音。在中共戰爭與暴力的陰影下，教會唯有首先順服於主耶穌的啟示，才能在其見證中獲得新的力量。因此，教會的首要使命不是針對一項具體宗教政策進行抵抗或合作，而是要宣揚基督已經戰勝一切形式的權力，包括中共所掌控的政治軍事力量。

見證上帝和平的國度，除了上述的規範立場，教會還必須在多方面付諸實踐。首先，在和平呼召之下，教會需要培養在複雜的政治軍事環境中分辨諸靈的實踐能力。基督教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 – 1968）曾提醒戰時的教會：「基督徒必須考慮到各種屬靈的權勢，包括種類不同的、良善和邪惡的靈，並且在上帝話語的聖靈引導下，按照祂的標準，辨別這些靈，並根據這種辨識調整自己的態度：不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而是以一種方式，同時拒絕其他方式。」⁴

此外，讓和平的國度成為教會見證的核心，教會需要真正創建起基督信仰美德的共同體。為此，教會必須深化內部文化建設，尤其是對和平價值與相關倫理規範的闡釋與實踐。在戰時透過信徒小組進行主題查經與佈道，能有效培養和平視野與靈性操練。藉由有針對性的門徒訓練，以及持續而低調的社區參與及服事，牧者和信徒得以培育在暴力無法根除的現實中前行的勇氣，操練慈愛、忍耐與盼望的品



格，以及在合作、抵抗和妥協行動中拒絕暴力的能力。透過這種方式，教會得以在政治鬥爭和衝突中活出基督的樣式，成為照亮人們心靈的和平燈塔。

最後，心懷和平使命與復活盼望的普世華人教會和信徒，應打破地域、宗派、階層和族群邊界，尋求利用各種區域和國際性教牧合作平台，建立起反戰團結與互助機制。這是華人教會在戰爭處境下效法基督的必要嘗試。因為，耶穌基督的典範對我們而言，不僅是在宗教菁英的體系之外拒絕權力威脅和誘惑的典範，也是聆聽那些正在忍受戰亂、迫害、疏離和邊緣的群體呼聲與禱告的典範。正是這一典範，不斷提醒我們負責任地分辨正義與不公、自由與奴役、真理與謊言，幫助教會踐行基督的愛與正義。

教會應當銘記：基督的復活與呼召，才是教會和平盼望與實踐的泉源。唯有在不懈追尋和平的旅程中，我們方能體悟，和平的實現超

越人間的謀劃與努力，真正源於與那位和平之子的真實相遇。✚

作者為旅英學人，《追尋和平的國度》一書之主編。

註：

1.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Rough Notes,” *New Left Review* 61 (2010), 63.

2. 邢福增：《共產中國的宗教問題：以黨國與基督教關係為中心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2期，2023年12月，第131頁。

3. 黨內官員與學者普遍主張，必須構建相對穩定的宗教管理框架，並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關鍵功能。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4. Karl Barth, “Political Decisions in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gainst the Stream: Shorter Post-War Writings, 1946 – 1952* (London: SCM Press, 1954), 153.

戰時華人教牧的流動性/不流動性及其啟示

王約旦

192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五卅運動、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及冷戰等重大衝突與戰爭，它們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也對華人教會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本文以計志文（1901 – 85）和趙世光（1908 – 73）為個案，分析戰爭前後華人教牧的流動性/不流動性。

計志文與趙世光的生平有諸多相似之處：二人均出生於1900年代，在上海成長，在1925年上海大復興中獻身傳道，在1930 – 40年代成為著名佈道家，在1940年代建立本土教會與宣教機構（計志文於1947年成立中國佈道會，趙世光於1942年成立靈糧堂，於1945年成立靈糧世界佈道會），在1949年將事工重心轉至香港，並在1950年代以來以香港為基地向海外繼續拓展。本文對二人的流動性/不流動性作出三點分析：能動性與結構的互動塑造複雜的去留抉擇；能力與意願交織導致自願流動/滯留與非自願流動/滯留之間的模糊性；以及戰爭危機中

事工的延續性。

去留的多重因素

在華人教牧決定去留的過程中，能動性與結構的相互作用至關重要。這些選擇受到政治、神學、社會網絡、家庭和個人因素的綜合影響，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去留框架。首先，政治因素是核心影響之一。趙世光在1946年曾出席蔣介石夫婦在上海舉行的招待茶會，與會者包括政、學、教界著名人物，散席後蔣還單獨接見了趙世光等三位牧師。1949年2月他又在蔣引退後的故鄉奉化領會。此後兩份香港報紙指控他與蔣介石有政治關聯，導致一些基督徒不再參加靈糧堂，甚至有曾得到他幫助的姐妹在街上與他形同陌路。他與國民黨的密切關係，使他面對新生的共產主義政權的時候，感到自身及事工受到威脅，最終促使他決定離開中國。

其次，神學因素提供了流動決策的正當化

摘要：本文以計志文和趙世光為個案，探討20世紀華人教牧在戰爭前後的流動性/不流動性及其對華人基督教發展的影響，揭示政治、神學、社會網絡、家庭和個人因素的相互作用。本文作出三點分析：能動性與結構的互動塑造複雜的去留抉擇；能力與意願的交織導致自願流動/滯留與非自願流動/滯留之間的模糊性；以及戰爭危機中事工的延續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obility and immobility of Chinese pastor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wa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sing Andrew Gih and Timothy

Dzao as case studies. It explores how these patterns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highlights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al, theological, social, familial, and personal factors. The article offers three main observations: first,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agency and structure shaped complex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to stay or leave; second, that the intertwining of capability and aspiration blurred the line between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obility or immobility; and third, that ministry often continued across wartime crises.

基礎。計志文在1949年從美國回中國途中領受異象：「上帝對我說，我應該選擇某個基地來訓練基督的士兵，用福音進攻中國，就像美國艦隊選擇中途島（Midway）和威克島（Wake Islands）作為攻擊強大敵人的基地並戰勝他一樣。」¹ 同一年，趙世光在台北禱告三週後從啟示錄十八章4節中——「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獲得引導，決心回上海之後，帶妻兒離開中國。² 神學信念使他們的去留決定不僅是面對現實壓力，還被賦予了屬靈化的正當性。

第三，社會網絡也影響了二人的流動決策。計志文早在1938年就與上海伯特利教會的同工帶領神學生和孤兒院的孤兒一起避難香港。此次先例或成為他1949年再次來港定居的參照經驗。戰後，他也曾再返港到不同教會講道，表明他與香港部分教會已經建立信任網絡。趙世光從1932年到1949年間在香港獲得至少六次領會機會，與包括浸信會平信徒領袖林子豐博士在內的香港教會領袖過從頗密。1949年10月抵港後，他通過伯特利神學院的藍如溪校長等人暫時安頓家庭，隨後借用九龍山林道浸信會開設靈糧堂。香港的教會和基督徒網絡，為二人的事工提供了必需的資源，成為他們在1949年之後發展事工的重要基礎。

最後，家庭和個人因素同樣重要。1949年計志文由美國抵達香港的時候，他患肺病的太太已經離開上海，在香港休養。雖然他們曾想

返滬，但是戰爭下的航線封鎖使得二人只能滯留在香港。相比之下，趙世光的妻子和六個孩子仍在上海，他不得不冒險潛回大陸，並在10月1日中共建國大典當天秘密離滬，經他的家鄉浙江餘姚到舟山群島，搭最後一艘招商局輪船赴台。家庭因素使他的抉擇艱難得多。

自願與非自願的模糊性

在教牧的流動性/不流動性中，能力與意願的交織往往導致自願與非自願之間的模糊性。計志文和趙世光的案例充分展示了這一點：兩人在1949年前後的流動決策，並非單純的自主選擇或外界強迫，而是二者交織的結果。

計志文的經歷體現這種模糊性。1949年初他受邀赴美參加慕迪創始人週會議（Moody Founder's Week Conference），面對國共內戰時局惡化，本感到自己應該留在中國。後考慮到國民政府派和平代表與共產黨舉行和談，討論時間估計會有幾個月，他最終於1月29日登機赴美。5月底上海被攻陷時他尚在美國，回港後因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閻錫山下令封鎖航線而非自願滯留。他最初以為不久可與太太一



同回上海，因此雖然租用快樂戲院佈道，每次聚會都有幾十人決志，但他既不為他們施洗，也不組織教會，只鼓勵他們去附近各教會，直到兩年後才正式成立教會。他後來在著作中將香港描述為「向中國佈道的一個絕佳基地」：「作為一個在英國統治下的自由港，香港靠近中國，並且華人可以自由進出，不需要護照。」³ 滯留一開始是非自願的，隨後被他轉化為自願的福音拓展機會。

趙世光的情況同樣複雜。他離開中國既有非自願成分，包括政治逼迫和家人的安全顧慮；也有自願成分，譬如他相信上帝通過啟示錄經文指示他離開中國。他後來以清教徒自比：「像十七世紀的清教徒一樣，為了信仰，撇下一切。」⁴ 這一流動決定既是源於結構的非自願行為（戰爭與政治變動的大背景），又是具有能動性的自願行為（信仰引導）。

華人基督徒在應對未來可能的戰爭或政治動盪時，不應將流動或滯留簡單視為要麼是自願、要麼是非自願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需要看到，外在環境的限制與個人的宗教使命感經常同時影響去留決策。

戰爭前後的延續性

戰爭之前與之後的事工不單有斷裂性，也有延續性，後者尤其反映了教牧如何在危機中延續使命。計志文的事工軌跡展現了這種延續性。他在1931-35年通過伯特利佈道團走遍133個中國城市建立的佈道網絡和知名度，為此後在香港和海外的的事工奠定了基礎。1937年避難香港時，他從上海帶出神學生和孤兒超過一百人，在港重啟孤兒院和聖經學院，延續了伯特利教會的使命。戰後，1947年他在上海借用大滬舞廳為華北來的難民舉行國語崇拜，每主日約一千人參加。1949年他到香港後沿用同樣的策略，租借快樂戲院向難民講道，首個禮拜即有一千多人來聽道。他在《竹幕後的教會》一書中呼籲，不應為中國的門關閉而悲嘆：「一些人為中國的門關閉而悲嘆，卻對中國境外的兩千五百萬華人置之不理。當你有能力做些什麼時，為什麼要因錯失機會而悲傷呢？」⁵ 1952年他在印尼成立東南亞聖道神學院，該神學院培養出唐崇榮等著名佈道家，將事工從中國延

續到全球華人中。

趙世光的經歷同樣如此。他於1936-41年在南洋的佈道奠定了印尼事工的基礎。1941年底他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被迫滯留上海，由此創辦靈糧堂，隨後也將事工從上海擴展到南京、杭州和蘇州等城市。1947年靈糧堂總堂建成新堂，每個禮拜日已有千人以上參加。他在1945年中日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候成立靈糧世界佈道會，差派傳教士赴



印度和印尼。到香港後，他延續未竟的南洋佈道事業，1952年舉家赴印尼，在雅加達設立印尼靈糧堂事工總部，1956年成立迦瑪列大學。1955年起他展開環球佈道，1965年在韓國一個半月曾對50萬人講道。到1967年，靈糧堂分會已遍佈美國、歐洲、東南亞、日本、非洲等地。

這些案例表明，戰爭不必然中斷事工，反而可能成為事工更新和擴展的契機。在基督教歷史上，福音因戰爭、逼迫、流亡而傳播的例證屢見不鮮。當代華人基督徒即使面對戰爭危機帶來的非自願滯留或流動的困境，也可以在「不得時」中保持心意更新，積極尋找機會以服事有需要的群體，延續福音使命。✚

作者為宗教研究哲學博士，主修中國基督教史。

註：

1. Andrew Gih, *The Church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London: Marshall, Morgan & Scott, 1961), 37.
2. Charles Mashburn, *A Disciple Called Timothy*, 2nd ed. (Hong Kong: Spiritual Food Publishers, 1960), 75.
3. Gih, *The Church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55.
4. 彭善彰：〈美帝分子一手扶植起來的趙世光〉，載《天風》第612號（1961年9月30日），10。
5. Gih, *The Church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59.

中國教會為何需要 教會論？

葛牧之

摘要：中國教會面臨發展停滯與挑戰，其根源在於缺乏處境化神學，尤其是教會論的建構不足。這使信徒對政教關係與宗派問題認識模糊，福音也難以深入社會。本文通過歷史案例，如教父時代與宗教改革，說明神學突破能推動教會轉型與發展，並呼籲中國教會亟需建立符合本土處境的神學。

Abstract: The Chinese church today faces stagnation and a range of pressing challenges, rooted in the lack of contextualized theology—particularly a developed ecclesiology. This

deficiency has led to confusion among believers regarding church–state relations and denominational issues, while also limiting the gospel’s ability to engage society more deeply.

Drawing on historical examples such as the Patristic Period and the Reformat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s have 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renewal within the church. It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church urgently needs to develop a theology that is grounded in its own context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faithfully.

引言

今天的中國教會面臨諸多挑戰。面對這些挑戰，中國教會亟需完成的任務是構建處境化神學，尤其教會論。這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回應這些問題。比如，政教關係是備受關注的議題。目前教會內部對此存有不同看法。有些信徒認為教會應當積極參與社會公義議題；另一些則主張聚焦福音，不應參與政治。然而，雙方觀點多基於個人立場，缺少了系統的神學反思。神學——尤其教會論——的缺乏使我們

不能對教會的本質、使命方向及與社會的關係等問題有清晰的認識，不能為如何處理政教關係指明方向。不少教牧同工和信徒對教會現狀與發展方向感到茫然，這反映出神學框架和神學思維能力的薄弱。

另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是宗派的興起。早期宗派由外國宣教士帶入中國，但在他們離開後基本消失，中國教會逐漸形成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兩大體系，宗派長期以來並不為中國教會所熟悉。然而，近十年來，一些宗派，尤其是改革宗，高調進入並



迅速發展，對中國教會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改革宗為中國教會提供了建制上的幫助，其對文化的關注也有助於糾正教會的避世傾向，推動教會更積極地進入世界；但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在信徒中滋生自大和論斷，導致不少教會出現嚴重分裂。這使我們反思：改革宗何以在中國興起？宗派究竟是什麼？中國教會是否需要宗派？若需要，又應當需要什麼宗派？若不能回應這些問題，我們就無法恰當地理解和處理宗派問題。為回應這些挑戰，中國教會必須建構處境化神學和系統的教會論。

神學的缺乏與教會發展的停滯

事實上，中國教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處境化神學的建立。筆者認為，處境化神學的缺失已嚴重制約了中國教會的成長。過去，信徒人數的快速增長曾備受關注，甚至有人預測中國將在2030年成為基督徒人數最多的國家。¹ 中國教會確實經歷過快速擴展，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的「基督教熱」。²

然而，當前中國教會在多個層面已顯現停滯跡象。一方面，信徒人數增長明顯放緩。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報告指出，中國基督徒人數在上世紀80、90年代快速增長後，近十多年來已趨於停滯。³ 儘管海外對此有不同聲音，但不少國內學者認為，一些地區的基督徒人口甚至出現下降。⁴ 另一方面，曾在高校中興起的「基督教熱」已基本消退，基督教研究在學術界被邊緣化，大學生對基督教的興趣顯著下降，校園福音工作日益艱難。



教會發展停滯的原因複雜多樣。生活水平的提升增強了國人的自信，削弱了對信仰的需求；民族主義的上升也使基督教更易被視為「洋教」而遭排斥。然而，筆者認為，決定性因素並非外部環境，而是教會自身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正是處境化神學的缺乏。

首先，處境化神學的缺失使中國教會未能有效地實現基督信仰的本色化，導致許多知識分子仍將基督教視為西方宗教而加以排斥。上世紀90年代的「基督教熱」，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知識界對西方文明的嚮往。當時基督教被視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受到關注。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民族自信的提升，中國社會對西方的興趣逐漸減弱，民族主義的上升也使基督教更容易被質疑為代表西方價值的宗教，「基督教熱」隨之消退。

遺憾的是，由於長期缺乏處境化神學，中國教會未能將基督教轉化為中國人的信仰，反而固化了其「西方宗教」的形像。本色化的失敗必然導致文化人群體與基督教的疏離。一百年前的「非基運動」中，基督教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而遭到激烈批判；而在此後一百年裡，中國教會並未作出有力回應，⁵ 使「基督教是外來宗教」以及「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的觀念至今仍未根本改變。

其次，神學上的缺陷使中國教會難以將基督信仰帶入社會，限制了福音在更廣範圍內的傳播。長期以來，基要主義的內向化削弱了福音的社會向度，使基督徒難以在公共領域作見證。在倪柝聲、王明道等人的影響下，中國教會普遍接受聖俗二

分，將福音視為純屬靈事務，與社會、文化和思想無關，從而削弱了福音的公共性。一位當代中國教會的傳道人指出：「傳統教會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就是逃避現實並妖魔化世界，結果是把基督信仰變成一種出世的宗教，在教會和世界之間建了一堵密不透風的牆，在這裡屬靈和屬世絕對涇渭分明，必須把人從世界往教會拉，但要教會進入社會影響文化萬萬不可，因為這會沾染世俗的『污穢』。」⁶ 這種二元論使信仰與社會生活脫節，教會與社會彼此隔離。教會一味躲避世界，反而使世界遠離教會。要突破這一困境，中國教會必須超越基要主義的神學限制，建立更整全的福音理解和更寬廣的基督教世界觀。

神學的構建與教會發展的突破

回顧教會歷史可以發現，任何時代和地域中教會的重大轉型與突破，都離不開神學的建構。初期教會從邊緣群體進入「教父時代」的轉型，正是一個典型例證。教父時代不僅是教會歷史的高峰，也使基督教深入羅馬文化，成為真正的普世宗教，並深刻塑造了西方文明。這一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教父神學的建構，而教父神學本身正是處境化神學的典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基督教的希臘化。基督教最初只是源自邊陲地區的猶太宗教，要進入羅馬社會並被外邦人理解，必須與古希臘思想展開對話。為此，查士丁、亞歷山大的克萊門特等深諳希臘哲學的教父，努力在基督信仰與希臘哲學之間搭建橋梁。這一進程中的關鍵突破，是邏各斯（Logos）基督論的建立。依據約翰福音「太初有道」的啟示，查士丁指出，基督就是哲學家所追尋的邏各斯本身，一

切真理都源於並指向基督。哲學只能部分認識邏各斯，而惟有在基督裡，人才能認識真理的整體。查士丁寫道：「每個人按照他分有的邏各斯的精子，所說的都不錯，都看到了與這部分邏各斯相關的東西。……人中間若有誰說了正確的事，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財富。……所有作家能藉著根植在他們內心的邏各斯，模糊地看見諸實在。」⁷ 因此，希臘哲學並非與基督教對立，而是對基督的預備。正是通過這一神學突破，基督教超越了其猶太民族背景，在神學上打通了與希臘思想的關聯，首次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宗教。這表明，處境化的神學建構為教會的突破性發展奠定了基礎：神學的突破，帶來了教會發展的突破。

宗教改革是神學突破推動教會轉型的又一重要例證。儘管宗教改革的成因複雜，但神學上的更新無疑居於核心地位，其根本目標在於使教會回歸聖經真理。路德認為，天主教最根本的錯誤在於偏離了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宣告的「因信稱義」教義。對路德而言，人生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找到滿有恩典的上帝？起初，他與當時的主流神學一樣，認為得救取決於人的道德努力、苦修與操練。⁸ 然而，在屢次失敗後，路德陷入深刻的痛苦與絕望。後來，在威登堡大學研讀聖經的過程中，他重新發現

「因信稱義」，認識到人得救完全出於上帝的恩典，並藉著信心白白領受。這一神學洞見不僅帶來了路德個人靈性的更新，也引發了整個西方教會乃至社會的深刻變革。⁹

宗教改革再次

印證：神學的突破，帶來教會發展的突破。

結論

由此可見，教會在廣度與深度上的發展離



不開處境化神學的建構，中國教會亦不例外。然而，在反智主義的長期影響下，中國教會，尤其是傳統保守教會，往往輕視甚至排斥神學思考，¹⁰ 既未能對當代處境中的關鍵問題作出整全回應，也未能在處境化神學，尤其教會論的建構上，取得實質進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教會的發展停滯。

要扭轉這一局面，中國教會當務之急是建構當代中國處境中的神學，而其中的核心任務正是教會論。惟有在深刻把握教會的本質與使命的基礎上，才能對政教關係、宗派問題等重大議題作出有效回應，並為中國教會的未來及其在普世教會中的定位指明方向。

作者為西三一大學ACTS神學院中文部主任。
註：

1.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0776023/China-on-course-to-become-worlds-most-Christian-nation-within-15-years.html> (2025年1月17日訪問)。
2. 1990年代的「基督教熱」主要發生在中國高校和文化界。
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

[reads/2023/12/12/chinas-christian-population-appears-to-have-stopped-growing-after-rising-rapidly-in-the-1980s-and-90s/](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2/12/chinas-christian-population-appears-to-have-stopped-growing-after-rising-rapidly-in-the-1980s-and-90s/) (2025年1月21日引用)。

4. 這是在2019年全國基督教年會上一些國內學者們的共識。

5. 葛牧之，「非基運動為何未能帶來中國的教父時代？」《華人教會神學研究》1 (2022)：1-11。

6. 這段話摘自網上的博客，轉引自葛浩，「聖俗二元論與宗教改革呼召觀」，載《新教神學、福音信仰與中國教會——紀念宗教改革50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華人牧者團契編（台北：天恩出版社，2018），305。

7. 查斯丁，《護教篇》，石敏敏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70-71。

8.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A Histor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NY: HarperOne, 2007), 42.

9. *Ibid.*, 41.

10. 關於反智主義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可參考葛牧之，《中國教會的反智主義》（新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社會研究中心，2025）。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4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 ____本 (3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 (9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 (15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 (15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 (15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 (10元)

____ 《直面撕裂—中國基督徒的信仰挑戰》 ____本 (15元)

____ 《城市教會的興起、管理與牧養》 ____本 (15元)

____ 《萬有之上一—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 ____本 (15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AI時代的講台： 講道語言更趨向主觀化

陳道德

摘要：AI與後現代文化促使講道語言轉向第一人稱，強調個人經驗以建立共鳴與信任。此趨勢雖可能成為真理溝通的橋樑，卻也帶來相對主義與表演化風險，從而促使講道者更重視靈修、釋經過程與真實生命見證。

Abstract: AI and postmodern culture are pushing preaching language toward the first person, with greater emphasis on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way of building resonance and trust. While this shift may serve as a bridge for communicating truth, it also carries the risks of relativism and performative preaching. As a result, preachers are being driven to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spiritual formation, the process of exegesis, and the witness of an authentic life.

在當前AI時代，講道的敘述語言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而明顯的轉向，即變得更趨向主觀化。這並非指聖經信息變得更主觀化，也不是指多了第一人稱的敘述式講道法（Narrative Preaching）；而是指講台傳遞信息時，愈來愈多採用主觀性的第一人稱語言，如「我」或「我們」，使講道更直接呈現講道者自身的理解、視角與生命經驗。

即使在嚴謹的釋經後，講道者仍可能表達類似這樣的語句：「學者如此解釋，但我認為……」或「我認為這段聖經在表達……」。這樣的敘述反映了一種自我展露的真誠，講道者不再隱身於客觀權威的背後，而是以具體、可感的人格面貌出現在講台上。

而在講道例證和應用方面，講道者也會更傾向於以個人親身經歷與反思作為講道素材，取代傳統常用的名人名言或寓言故事。即便引用時事新聞，敘述者多半也會加入主觀視角，如：「我看到一則新聞……」或「TikTok給我

推送一條視頻……」，以此拉近與聽眾之間的距離。同時，講道者的應用語言也傾向於淡化命令式的第二人稱「你」或「你們」，而改用比較有具體感的第一人稱「我」和「我們」。

這種第一人稱敘述越來越重的講台語言轉向，不只是風格選擇，也關乎講台如何被信任與理解，但也為講道帶來新的張力與反思。

後現代文化已開啟講道語言的主觀化傾向

現今世代文化所帶來的挑戰，在AI時代之前早已浮現。後現代人重視體驗、關係與多樣性，因而對抽象的教義與權威式的敘述語言感到疏離。應用在講道上，人們對客觀化、說教性的講台語言日漸抗拒，對傳統命題性、演繹三點式的講道方法愈發不再共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講道法（The New Homiletic）於二十世紀後期應運而生，它旨在回應後現代對權威與理性的質疑，以及傳統講道與聽眾生活

脫節的問題。

新講道法主張講道者當「如一個沒有權威的人」(Fred Craddock)，不再倚賴命題式的宣告，而是透過故事、經驗和聽眾參與，尋求更具共鳴的傳講方式。相較於傳統以演繹與獨白為主的講道形式，新講道法更強調歸納、敘事與對話，使聽眾在探索與互動中理解信息。

在此脈絡下，講道者若能以第一人稱敘述自身的經文研究和生命經驗，以此方式訴說真理，更容易建立共鳴。相對於「你該相信什麼」的說理方式，人們更願意聆聽「這是我如何相信的」。

AI正在加速主觀化講道語言的轉向

另一方面，AI加速了主觀化講道語言的轉向。無論人們是否同意，AI已開始影響現代人的語言使用與思考方式，也改變我們接收與理解資訊的途徑。所以AI對後現代文化的影響，並非簡單的顛覆或取代，而是將既有趨勢推向更快速和精緻的發展。

對於講道者而言，ChatGPT這類AI工具對文本(講章)生成的深度介入已然成為日常。雖然這方面的倫理有待探討，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原文解經、資料蒐集與講章撰寫的門檻已經大幅降低；只要願意，甚至整篇講章文本也是唾手可得。過去講道者的專業優勢(如神學與原文訓練)已然不再，本來所剩無多的講台權威也自然更加被削弱。

面對這種挑戰，講道者本能更加重視個人原創性和屬靈真誠的展示，藉此證明講章文本並非都是AI生成的產物。因此，講道者會更主動地呈現自己的講章預備過程，讓會眾看見自己如何從經文中被觸動和挑戰。這種在過程性上更透明的分享，加上個人生命經歷、牧養觀察與具體處境，自然形塑出更主觀化、更個人

化的講道語言。這種取向不僅使經文信息在具體處境中更具感染力，並可在一定程度上重建講台的權威。

第一人稱的敘述語言未必削弱真理的客觀性

有人或許擔心主觀化的講道語言會不會降低真理的絕對性和客觀性？James Smith在《與後現代大師一同上教會》一書中，論及對後現代大師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文本以外無一物」的理解時指出：人類理性在認識世界這件事上已經失去了中立客觀的作用，我們唯獨藉著神的啟示，就是神對世界的詮釋，才能獲得正確的世界觀。他說：「我們的信心並非建基於客觀性，而是建基於聖靈那令人折服的能力(而那不完全是客觀的)；因此，失去客觀性，並不引致失去傳揚福音真理的勇氣」。

確實，我們可以宣告：「真理如此說……」；也可以敘述：「我所相信的真理如此說……」。這並非削弱真理，而是面對不同的文化情境和溝通對象，降低溝通阻力，為真理

創造一個被聽見的空間，一個可溝通的橋樑。事實上，使徒保羅多有類似「我所領受的」、「我如今所信的」、「我……」這樣的主觀語言。

保羅面對被多元文化困擾的哥林多教會，宣告說：「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

十字架」(林前二2)。這句話極其「霸道」，極具權威性，卻是保羅以第一人稱(主觀的「我」)來表達這絕對且客觀的十字架真理。

在羅馬書第七章7至25節，保羅用第一人稱單數的方式來敘述罪帶來的掙扎和煎熬。在主體「我」的論述中，激烈的衝突、煎熬和絕望不斷地在「我」的信仰人生舞台上演，最後導致「我真是苦啊……」的深切哀嚎。聖經學者會探討「我」到底是指誰：是信主前的



保羅？還是信主後的保羅？或是以修辭的方式描述某個群體？無論哪一種觀點，從信息溝通的角度，保羅是用主觀的方式敘述罪與誘惑的真理，剖析極其深刻，效果極具震撼力。



共向度，以致於造成信仰群體走向內向化？若第一人稱的敘事只是在熟悉的信仰群體中被理解與共鳴，講台會否退縮成為一個彼此取暖的空間，從而失去對公共議題的回應能力呢？又或者，有沒有可能當我們謙卑地以

第一人稱「我」來講述信仰故事時，反而會被接納而開啟一個更廣闊的公共對話平台呢？

因此，在後現代情境下，適度而負責任的第一人稱主觀敘述，未必削弱真理的客觀性，反而可能成為真理進入具體生命處境的必要途徑。

主觀化講台語言的風險和張力

然而，主觀化的講台語言並非沒有代價。當第一人稱逐漸成為講道中重要的敘述語言時，講道者也同時走進一個更為複雜且充滿張力的講台處境。

首先，講道者必須面對一個根本性問題：會否帶來相對主義的危險？若講道在尚未經過嚴謹的釋經與神學辨析之前，便急於訴諸個人理解和經驗，是否會導致核心信息被稀釋，淪為「只要你覺得好就是好」的心靈雞湯？那麼我們又如何思考在敘述第一人稱「我所相信的……」之後，建立「因經文如此說……」的規範和光照？

其次，當「我」的理解和故事被視為講台有效的溝通資源時，講道者可能面臨一個倫理誘惑：真誠是否會被技術化，甚至被表演化？後現代聽眾通常具有更強的共情力，尤其容易體恤個體的境遇與軟弱。那麼，講道者會否為了迎合期待而刻意製造或誇大自己的故事？或在敘述效果上將講台見證淪為矯揉造作的表演？

再次，主觀敘述的趨向會否改變講台的公

第一人稱「我」來講述信仰故事時，反而會被接納而開啟一個更廣闊的公共對話平台呢？

最後，主觀敘述還可能面臨一個現實問題：「我」的故事不夠怎麼辦？AI時代的講道者為應對不被信任的內在焦慮，或能更誠實地回到神面前，也可能驅使人不斷「生產」更多的個人故事，以維持講台的說服力。如此，「我」不再只是敘述主體，而可能成為一個需要不斷被填補的資源。那麼，若資源枯竭，該怎麼辦呢？

總而言之，正是在這些張力中，AI時代的講道者需要思考：如何在深刻擁抱主觀敘述的溫度與真實性的同時，不迷失經文的真理座標？如何用「我」的故事，準確有力去闡明「祂」的故事？當「我」的故事逐漸耗盡時，又該從何處持續領受可述說的生命信息？

AI時代的講道預備，當「多走一里路」

相對於客觀資訊，AI時代真正所稀缺的反而是具體且真實的主觀故事。這些故事無法依靠資料堆砌，因此今日講台比過去更具挑戰性，講道預備也必然成為必須「多走一里路」的屬靈操練。

1、靈修不只培育敬虔，也是生命故事的轉化場。

AI時代講道者真正獨特並不可替代的，是

自己與神同行的真實經歷。因此，今日講道者比過去任何時候，更要在乎屬靈生活的真實與深度。靈修（包括讀經、禱告、默想等）不只是培養敬虔、與主建立關係，也是講道者生命故事的轉化場。在靈修中，被光照、被安慰的經歷，都可成為講道中最有份量的素材。若靈修生活缺乏，屬靈生命則空洞，講道就容易淪為流於表面的技巧堆砌，重複地說著屬靈口號和籠統的應用，從而難以觸動人心。

2、釋經不應只呈現結論，也需讓人看見詮釋過程。

AI能輕易生成釋經分析，但無法取代釋經過程中的生命參與。講道者不能只講出「經文的意思」，也需要呈現「自己如何經歷經文」，內容包括「我」原本怎麼理解這段經文，在哪些地方被修正，這段經文如何對當代處境進行挑戰，又是如何對付「我」的。這樣的釋經過程展示不僅能具體呈現真理的意義，也可成為講台權威的新來源，使聽眾看見信息的力量如何先臨到講道者，再臨到他們。

3、牧養現場不僅建立關係，也不斷生成可述說的生命故事。

AI能提供海量資訊，卻無法建立關係，但講道的力量往往來自關係中的理解與故事。當代聽眾期待的已不只是「講得好」，而是「是否與我有關」。因此，講道者必須走進牧養現場，而非停留在電腦桌前。透過探訪與對話，牧者能看見年輕家庭的育兒壓力、長者的健康焦慮、職場人士在信仰與倫理之間的掙扎。這些真實處境能轉化為講道中具體的故事，使主觀敘述不致抽象，而能真正產生共鳴；使福音在聽眾的世界中變得可觸、可信、可經歷。

4、更厚實的生活實踐，加上更日常的神學反省。

此外，講道中的真實故事不僅來自於牧養的對象，也來自於講道者本身的個人經歷。因此，講道者需要有更厚實的生活實踐，如：旅遊、大自然觀察、閱讀、藝術欣賞、社會參與、家庭互動等等。若生活經驗貧乏，主觀敘述便容易重複、空泛、缺乏深度。講道者不僅要主動拓展生活觸角，而且學習以神學眼光持續反思日常，使經歷能被轉化為真實、深刻的


講道語言。這正是AI時代講道者不可忽略的重要操練。

5、講台上的「我」不只是角色，更是經得起信任的生命見證。

AI可以生成內容，卻無法生成生命，更無法建立講道者與會眾之間的信任。AI能力日益強大，聽眾也愈加在意講道是否出自於真實的生命經驗；他們開始辨識哪些是AI語言，哪些是源於講道者的生命見證。傳播研究指出，內容愈是容易取得，人們對其真實性與可信度的判斷反而愈低，這正是所謂的「資訊過剩悖論」。再加上後真相文化的影響，聽眾不再單憑內容本身判斷真偽，而是更倚賴講道者是否值得信任。因此，當代講台的可信度愈發取決於講道者的呼召、人格與誠信；真實而誠實的講台生命，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結論：AI時代的講道，第一人稱越發「沉重」

在AI使資訊資源不再稀缺的時代，講道者真正的獨特性，已不在於所掌握的內容，而在於所承載的生命。講台語言日益主觀化，既回應後現代文化的語感，也揭示會眾對講道期待的轉變，人們渴望聽見一個真實的人，如何被上帝的話塑造與引導。這並非否定真理的客觀性，而是讓絕對的真理以可觸、可感的方式再次進入當代處境。也正是在此意義下，講台的權威或可被重新理解與建立。

在AI時代的講台上，第一人稱的「我」越發沉重，不再只是代名詞或修辭，而是一種需要用生命承擔的屬靈責任。 

作者為谷區國語浸信會華語部牧師。



漫漫歸途

介紹《救贖與革命》一書

孫澤汐

摘要：本文介紹《救贖與革命：二十世紀中國新教知識人的心靈之旅》（暫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5）的寫作緣起、主要內容與當代意義。本書追蹤趙紫宸、吳耀宗、蔡詠春三位新教知識人，從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心靈歷程，探討他們如何在信仰與國族之間尋路，並以「歸途」為意象，揭示這段旅程對當代華人基督徒的啟示：基督徒蒙召不是攀附國家權力，而是在對自身力量的絕望中，依靠聖靈以愛見證福音，更新民族。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Salvation and Revolution: A Twentieth Century Odyssey*

of the Chinese Protestant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5). Tracing three Protestant intellectuals—Zhao Zichen, Wu Yaozong, and Cai Yongchun—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book examines how they navigated the tensions between Christian faith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Using the metaphor of an “odyssey,”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book’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Christians: a call not to be allured by statist power, but to witness to the Gospel in love, finding strength from the Spirit precisely where human strength fails.

何謂「奧德賽」？

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奧德修斯歷經戰爭與漂泊，踏上一段歸途未卜的旅程。本書以「奧德賽」為意象，正是要捕捉二十世紀中國新教知識人的心靈歷程：那不是一條凱旋的直線，而是在信仰與國族之間反覆摸索、屢經挫折、卻始終懷抱盼望的曲折之路。他們的「應許之地」，一個既屬基督又屬中國的美好願景，似乎永遠可望而不可即。然而，正是這份執著的盼望，構成了他們生命最動人的底色。

回到當下的起點

2018年12月，成都秋雨聖約教會遭大規模搜查，王怡牧師隨後被判九年徒刑。王怡將此事件置於末世論的視野中：真正的衝突不在教

會與國家之間，乃在上帝的主權與一切僭越的地上權柄之間。與此同時，「基督教中國化」政策要求教會在講道與神學教育中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有趣的是，約一世紀前，鮮有新教知識人反對本色化；他們反而感嘆教會缺乏自治、自養、自傳的能力，渴望建立融合基督教與中華文明的本土教會。從擁抱國族的教會到抵抗被國族收編的教會——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本書正是循著這條線索，回到歷史的源頭，尋找理解當下的鑰匙。

三位旅者，一場風暴

本書追蹤三位新教知識人——趙紫宸（1888 - 1979）、吳耀宗（1893 - 1979）、蔡詠春（1904 - 1983）——從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

命的漫長旅程。他們神學立場各異，卻共享一個信念：基督教是中華民族更新的關鍵力量。

二十世紀初，他們與許多同代信徒一樣，推動著一種「自由派會通」(the liberal synthesis)——融合基督教倫理、社會行動與國際視野，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然而隨著國難加深，路徑開始分岔。吳耀宗日益左傾，走向與中共的深度合作，將革命視為「光明」與「黑暗」的末世之戰；趙紫宸和蔡詠春則經歷戰時的囚禁與苦難，轉向對上帝超越性的探索，在教會的禮儀與團契中尋找力量。

1949年之後，分歧的路徑匯入同一個政治漩渦。無論是擁抱新政權的吳耀宗，還是在夾縫中保存信仰的趙紫宸和蔡詠春，都無法逃脫一個殘酷現實：當黨國將自身神聖化、宣稱對救贖持壟斷權時，獨立的信仰聲音便成為一種威脅。文化大革命將此邏輯推向極端——即使最順從的知識人也難逃迫害。

書中最令人動容的，或許是這些知識人晚年的「歸途」。蔡詠春在病痛孤寂中重新翻開聖經，默想約翰福音，思索犧牲之愛與神的呼召。他感嘆被迫離開教會，卻在暮年重新渴慕「天國的大集體」。雖不無疑惑，趙紫宸也在生命晚年重拾聖經。基督化中國的梦想或已幻滅，信仰卻在生命深處重新萌芽。

這段歷史的啟示深刻而沉痛：當基督徒將盼望寄託於國家權力的槓桿，或將信仰與民族主義身分綁定，往往會在構建天國的願景中被地上的國度所收編。國家可以是信仰在世間展開的場域，卻不應也不能成為信仰的歸宿。三位知識人的故事，正是以親歷者的血淚書寫的見證。

在絕望中尋見力量

裴士丹 (Daniel Bays) 在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數十年後指出，「強勢國家的存在與否」是理解兩百年來中國基督教歷史最關鍵的因素。這一洞見在「基督教中國化」運動中再次印證。國家的自我神聖化不是二十世紀的遺跡，而是綿延至今的現實。對散居各地的華人信徒而言，理解這段奧德賽不僅是瞭解過去，更是辨識自身處境的呼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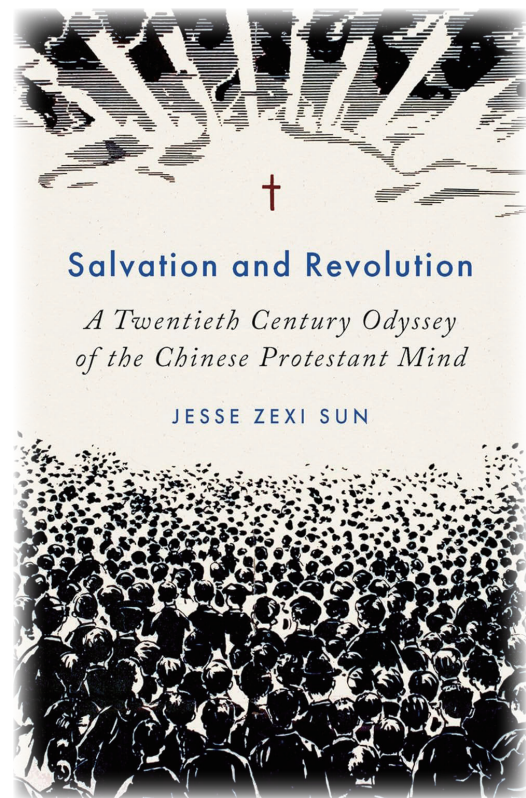
基督徒蒙召進入世界，不是依附權力或

以國族認同凌駕於天國身分，而是以愛見證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服事中更新社會。耶穌的話語蘊含深刻張力：祂宣告已勝過世界（約十六33），方才差遣我們進入世界（約十七18）。這是十字架的邏輯——我們被差入世界的憑藉，高過世界的權力結構；正是在對自身力量絕望之處，聖靈的大能才真正彰顯，使我們「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二十世紀中國新教知識人的奧德賽，正是這一真理最有力的歷史註腳。

旅程仍在繼續

本書的主人翁們從未抵達他們的「應許之地」。然而，他們在流亡、逼迫與幻滅中持守的信仰，並未隨其離世而終結。每一位在信仰與身分之間尋路的華人基督徒，都是這場奧德賽的繼承者。我們的盼望，不在於自己的航行能力，乃在於那位在風浪中與我們同在、並且已經勝過風浪的主。願這本書能成為一面鏡子，幫助讀者在歷史的迴響中，更清晰地聽見那位呼喚我們跟隨祂的聲音。✚

作者現任美國田納西州貝爾蒙特大學基督教歷史助理教授。



書評：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新教自由派的思想與生命之旅

姚西伊

摘要：本文是《救贖與革命》一書的書評，肯定其在三個方面具有開創性貢獻，並兼具學術深度與可讀性。

(書評原為提交予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英文稿，由本刊執行編輯翻譯，並由原作者修訂。)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Salvation*

and Revolution, highlighting it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in three major areas and its balance of scholarly depth and accessibility.

(The review was originally submitted in English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ed by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Blessings Magazine, and subsequently revised by the author.)

這本著作對中國的基督新教史研究——特別是民國時期自由派思潮——作出了重要貢獻。作者精心挑選了趙紫宸、吳耀宗、蔡詠春等一批中國基督新教知識分子，系統地描繪他們在中國歷史極為動盪的世紀中，在神學與個人生命上所經歷的跌宕起伏。

全書六章設計精巧，大體對應這些知識分子思想之旅的三個主要階段：前兩章探討自由派思想共識的形成，以及部分人逐漸向社會主義靠攏的過程；第三、四章聚焦自由派內部神學分歧及在新正統思潮影響之下相對保守的傾向之興起；最後兩章則描繪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中國大陸的調適與生存掙扎。

雖然中國基督教研究早已有不少關於自由派的討論，但這本書仍至少在三個方面實現了突破：

第一，方法論上的創新：以往有關自由派神學家和教會領袖的著作，多從個人傳記或社會文化角度切入。這本書則首次認真地嘗試從思想史角度切入，來研究這個群體。它旨在講述一個群體性的故事，勾勒一幅群像，並揭示其中所涉及的個人經歷背後的思想模式與歷史趨勢。

第二，問題意識的敏銳把握：在中國現代基督新教史中，自由派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神學共識的瓦解，或其思想路徑的分流，一

直未得到充分的研究。這本著作揭開了這一關鍵轉折及其直接後果。同時，作者提醒我們，有一件事始終把自由派凝聚在一起——那就是他們共同的「救國」熱忱。書中六章鮮明地呈現出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新教歷史經驗的發展性、多樣性與矛盾性。

第三，鮮為人知案例的發掘和呈現：除了中國基督新教史上數位著名人物外，書中還首次詳細地講述了蔡詠春、顧長聲等人的故事，透過紮實的史料挖掘功夫重建其生命軌跡，揭示世代更替、個人選擇與歷史沿革脈絡在中國基督教史上的重要性。這些案例不僅擴展了學術研究的視野，也讓讀者對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新教的歷程有更加立體化的理解。

總之，這本著作是一個傑出的學術成果，標誌著學界對民國時期基督新教歷史的認知顯著進深。而且，本書把宏大的歷史敘事和嚴肅的神學議題與個體生命的經歷結合在一起，因此具有高度可讀性。無論是作為研究資料或教材，甚至作為一般讀者的閱讀選擇，它的價值都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在Gordon-Conwell神學院任世界基督教與亞洲研究教授。

天上的阿爸 與 地上的兒女

天靈

摘要：本文記述作者參加「天父的心」培訓會的經歷與反思。人因與神隔絕而處於「無父」處境，需經歷身分更新與關係轉化。參與者經歷醫治與釋放，重新認識天父的愛，恢復兒女身分，並在生命中活出屬神的自由與更新。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counts the author's experience of attending a "Father's Heart" conference and reflects on its spiritual

significance. It argues that humanity, alienated from God, lives in a condition of spiritual fatherlessness and is in need of renewed identity and restored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healing and release, came to rediscover the love of the heavenly Father, and recovered their identity as his children. As a result, they began to live in the freedom and renewal that come from belonging to God.

引子

2023年年底，我第一次從陳祖幸牧師那裡聽聞「天父的心」事工 (<https://fatherheart.net/>)。他參加了當年在德州舉辦的「天父的心」主題培訓會；回來之後在同工會上分享，鼓勵我們積極參與，也撰文作見證（見《恩福》雜誌91期）。在祖幸牧師的鼓勵下，2025年8月28日到9月1日我參加了在南加州San Juan Capistrano舉辦的「天父的心」培訓會。由此，神讓我看到天父的奇妙與精準，祂在自己的時間裡成就我的心願！



性。即使在我們認識神和歸向祂之後，也長久難以進入到與天父親密的親子關係之中。這正是我們今日世代所處的伊甸園之外的生命狀態。

聖經如此告訴我們生命的真正來源與所屬：兒女是神的產業（詩一二七3~4），神託管自己的兒女給肉身的父母；而祂才是我們不朽靈命的真正父親！我曾經以為，每位歸向神的人都理所當然地明白這種與神靈裡的親緣關係。但是，在美國的生活

讓我看見，即使成長於基督徒家庭與教會，即使對聖經倒背如流，即使殷勤地服事教會服事神，這些都不等於我們能從認同肉身父母到成為天父孩子，真正的身分過渡與生命關係的認信和轉換還需要一段過程才能完成。

與天父關係的真實身分認定與關係切換，究竟如何才可以完成？帶著這樣的問題，我滿懷期待地參加了這個在神的時間和地點，為我而舉辦的「天父的心」培訓會。

人類世代的無父現實

我們人類自從始祖犯罪被驅逐出伊甸園，就開始了與神隔絕和流離失所的生活。然而，沒有認識神的時候，我們無從理解自己的這種處境。如此習以為常、耳濡目染地與神隔絕的文化，也是無父的文化，塑造了我們的第二天

重建與天父關係的契機和元素

1、參與者踐行彼此相愛的新命令。

這次「天父的心」主題培訓會參加者，包括三位講員，總計25人，其中10位是弟兄，15位是姊妹；年齡上，最小的是25歲弟兄，最大的是91歲姊妹。族群上，三位亞裔，包括我為華人，另外兩位是菲律賓和日本裔弟兄；其他多是歐洲和南美洲不同國家的混血後裔。地理上，有來自美西、美東和美南的人，講員中的一對夫婦來自歐洲。參加者來自社會不同行業，有宣教士、運動康復治療師、音樂人和教會敬拜帶領人、工程師、商人與教師，等等。儘管我們二十幾個人，從性別到年齡，從族群到文化，從教育到職業，有天壤之別，但是我們共同承受一位在天之父的愛，共同擁有創造我們的父神形像，在培訓會期間踐行和操練同一位神給我們「彼此相愛」的命令。

2、講員開啟我們認識天父的心。

培訓會有三個講員：來自英國和瑞典的宣教士夫婦Andy與Gunilla Glover，與來自北卡的Shanna Smith姊妹。他們不僅給我們帶來豐富的、與天父的心密切相關的內容，更是身體力行在這個培訓會期間，向我們展示他們對我們每一位參與者的愛，也是來自父神對我們的愛。如此一來，他們與我們分享的信息就有了生命，從抽象的文字，化成可以感知和可以觸摸的行動，讓參加者的心靈透過眼淚和歡笑流淌出來，發出聲音，成為可以記憶的生命被融化的閱歷。

這正是這個培訓會與眾不同的原因。他們在每一個分享的專題中，融入神的話語與他們

真實生命的經歷與關係。在前後4整天的時間裡，三位講員輪流圍繞「天父的心」主題，與我們分享了14個專題。我將心得整理成圖，圖中的標號是14個專題的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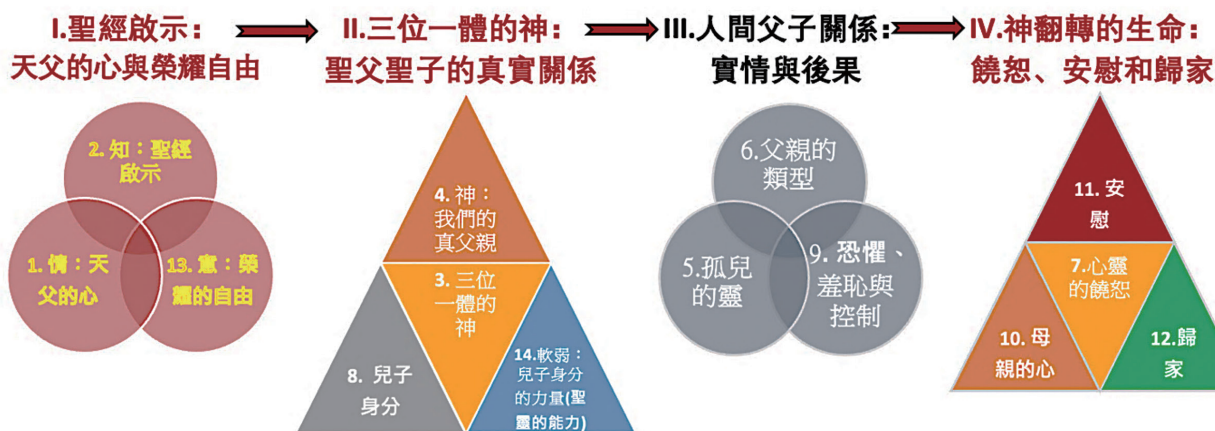
A·第一個三環交叉連環圖表示，神通過聖經向我們揭示祂作為天父的心，與祂要和我們分享的榮耀自由。

B·第二個四個三角形疊加圖說明，三位一體的神揭示聖父、聖子與聖靈之間的關係奧秘，包括聖父與聖子的真實親密關係，聖靈因著聖子的人性與軟弱而彰顯神的全能。三位一體的神向我們示範了人如何與天父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並因著神兒女作為人的軟弱，聖靈所彰顯的能力。

C·第三個灰色交叉連環圖，反映的是人間父子關係的實情與後果。講員向我們揭示了人間各種多半令人失望和受傷的父親類型，以及兒女在人间親子關係中所經歷的無父或父親缺席狀況，及其形成的孤兒心靈特質，並在恐懼、羞愧的情感體驗中，表現出控制與操縱的行為特點。

D·第四個圖示，四個三角形的疊加圖，反映天父定意翻轉我們現實的生命狀態——孤兒的靈，失望、恐懼、受傷和羞愧的心，缺失的父子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控制與操縱性處事方式，通過父神的母親情懷、犧牲愛子，而給了我們作為受害者的饒恕能力，和作為施害者的被赦權柄。這一切不僅僅給我們安慰，更讓我們脫離孤兒狀態，歸回與天父的真實親子關係，如浪子投入父親的懷抱。

E·從第四個圖示中的「歸家」專題，根據專題之間的序號，回到第二個圖示中「軟弱



成為兒子的力量」專題，再進入第一個圖示中的「榮耀的自由」專題。循著這個路徑，講員讓我們看見歸家的意義，就是我們人因著作為神兒女的軟弱，及聖靈的大能在其中的彰顯，能經歷到與天父真實和親密的關係，明白天父是我們的真實父親；知道我們與天父的親密，可以如同耶穌與父神的親密關係一樣，由此，我們最終能享受屬神的榮耀自由。

3、講員示範如何經歷天父的心。

會場的佈置、氛圍，給了我們一種家的感受。本地來參會的人可以自帶舒適的座椅、毯子、枕頭、小狗、畫本；外地的人可以自行擺設椅子座位，讓雙腿可以搭到另外的座椅上，而不必像在教室或會場裡那樣正襟危坐。會場也有毯子和沙發，好像心理諮詢室裡的環境或場景，讓參會者有賓至如歸的感受。我們可以用毯子蓋住雙腿，或者披在肩上，好像在家裡聆聽美妙的故事，而不是嚴肅的演講。茶點時間，很多可口的零食和咖啡陪伴我們的交流。所有這一切都帶給我們與家人在一起的感受，讓我們在放鬆的環境中，以各自舒適的方式去聆聽天父的心。

從一開始，我們就得到一項特別的參會要求，就是用心而不是用腦來理解和經歷天父的心。頭腦掌管的是邏輯和理性，而心才是掌管情感的地方，是我們與天父的心連結的地方。如何做到呢？講員Andy要求我們，整個會議都不能記筆記，因為記筆記就是在用腦；而且記筆記也讓我們難以專心地聽。這對凡事都想要記筆記的我，是個令人瞠目結舌的要求，然而很快我就體會到，這是一種巨大的釋放和自由。因為Andy也告訴我們，整個會議都被錄音，會議結束後，我們每個人都會收到全部錄音。他還告訴我們，用心聽到的東西是不會忘記的；我們能記住的比我們想像的要多！

講員自己的透明分享成為我們敞開自己心扉的榜樣。在14個專題的分享中，每個講員都真誠地向我們分享他們的真實過往與生命閱歷，無論多麼不堪。姊妹講員分享年幼時受到外界性侵的秘密，和母親的否認與掩蓋；弟兄講員提到因為缺乏安全感，而有孤兒心理和強烈的控制欲。他們所總結、分享的人間各種類型的父親，也讓我們所有的參與者都有不同的

共鳴，撼動我們的心，直面自己生命中的不堪與受傷，並分享出來。這是我們獲得醫治的開始，不再躲藏，不再掩蓋，不再恐懼被論斷或拒斥，因為我們的敞開所面向的，不僅僅是人，最終面向的是天父，是愛我們、要與我們有親密關係的天父；是要我們在與祂的親密關係中經歷祂的榮耀與自由的天父！

聚會除了系統的信息分享，也安排五段特別的時間，讓我們經歷與天父的親密心靈對話和來自祂的擁抱與愛。其中兩段時間在柔美的音樂聲中，以舒適靜坐或躺臥的方式，各自合目安靜地消化所聽到的信息，並且與天父在心裡靜默地交流，感受天父如沐春風和春雨般的愛，潤物細無聲地進入自己的身心。

一段時間用來給自己肉身的父親寫信，表達我們對天父的認識，和因此而有的對自己地上父親的理解與和解，並表達我們對父親的虧欠之情。

另外兩段時間是領受天父擁抱的時光，同樣是在溫馨的音樂聲中，三位講員讓我們輪流上前，透過他們的雙臂於胸懷，領受天父的擁抱。對於中國文化下長大的我，對於奉行「男女授受不親」戒律的我，對於與家中父母、兄



長和摯愛親朋無論多麼相愛，都從來不會擁抱的我，的確難以體會為我捨命的摯愛天父的擁抱，及其所表達的

愛。因此，聚會安排的這樣個環節讓我難忘，讓所有的參與者難忘！在擁抱中，我們脆弱恐懼的心得到釋放，我們徬徨無助的心得到理解，我們憂傷痛苦的心得到撫慰與修復。

結語

這是一個全人參與的聚會，是調動我們的聽覺、視覺、觸覺與整個全人身心靈的聚會，是從頭腦到心靈到行動全然體會天父之愛的聚會！在這裡，我們被更新，得釋放；從這裡，我們可以再出發，帶著天父的心與愛同行！盼望更多的人不會錯過這個美好的聚會！

作者為恩福學者事工專員。

(接封底)

動物森友會：新伊甸園

前些日子，筆者前往聖地牙哥加大 (UCSD) 的 Birch Aquarium 參觀，恰逢該館推出有關電子遊戲《動物森友會》(Animal Crossing) 的特別活動。這個原本輕鬆的展覽，卻讓筆者再次想到了以賽亞書的異象。

《動物森友會》由「任天堂」電遊公司於2020年推出，在疫情期間迅速風靡全球。它為玩家構建了一個溫暖而和諧的小世界——微風森林、海風沙灘、晴空島、波波河……在這裡，動物之間沒有掠食與被掠食的關係，狼與羊同居、同臥、同樂，貓和老鼠是好朋友，彼此來往、互動、團契。這個世界彷彿暫時脫離了現實的緊張與敵對，成為許多人在疫情動盪時期的心靈避難所。

筆者很少玩電子遊戲，卻被《森友會》中溫柔可愛的世界所吸引。回頭看來，這種吸引力正源於一種更深層的神學記憶——對新伊甸園、新天新地的嚮往。

水族館：從悠然到警醒

同樣的感受，也出現在水族館中。海馬和海龍在水中悠哉悠哉，色彩斑斕的魚兒來回游弋，閒然自在！友人說：「從小就喜歡去水族館寫生，看魚群在水中悠游，讓人忘卻世間的紛亂。」

水族館中，即便沒有「豺狼與綿羊羔同居」的直接畫面，但那種和諧與寧靜，仍然喚起人對理想世界的想像。可以說，人類對「新伊甸園」的渴慕，並非偶然，而是深植於受造的本性之中。

不過，現實很快將人拉回。當筆者在館內看到可愛的澳洲小藍企鵝時，一旁的標示牌卻提醒著遊客：「全球暖化正嚴重威脅牠們的生存」。這不禁令人心頭一沉。再想到南加州近期異常的氣候——3月份白日氣溫逼近華氏100度，更讓人感到不安與警醒。

這個世界，並非如水族館或遊戲中那樣單純美好，而是充滿張力與破碎。

應許的預嚐

羅馬書八章指出：「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22節)。然而，受造界不是只有承受敗壞，同時也「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19節)。受造界的歎息，不是絕望的呻吟，而是帶著方向的期待——期待那一日，神的兒女得榮耀，整個受造界也從敗壞中得到釋放。

以賽亞書所呈現的圖景，不是虛構的「烏托邦」或想像的「桃花源」，而是創造主所應許的終局；不是制度或科技所能建構的「理想國」，而是神親自更新萬有後所帶來的真實秩序。

電子遊戲中的溫馨互動，或水族館中的片刻寧靜，都如同對未來美好世界的「預嚐」。它們本身並非終點，卻指向一個更深的實在。信徒所盼望的，不是逃離現實的避風港，而是那真正臨到的更新之日——當神的國度完全彰顯，「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

在那日，受造之物不再歎息，世界不再破碎，一切歸於和諧與榮耀。這樣的盼望，使人在動盪中仍能存著堅定的信心，等候必定來到的完全更新。✚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不傷人，不害物

程媽兒

摘要：本文從戰爭與動盪的現實出發，對照以賽亞書所描繪的和平景象，並透過水族館與電子遊戲中的經歷，指出人心深處對和諧世界的渴望。雖然人類世界在敗壞中，萬物一同嘆息，卻仍存盼望，等候最終的更新與釋放。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reality of war and unrest, this article contrasts the present

world with the vision of peace depicted in the Book of Isaiah. Drawing on experiences in an aquarium and in the video game Animal Crossing, it points to a deep human longing for a harmonious world. Though creation remains fallen and groans under brokenness, hope endures. All things await their ultimate renewal and liberation.

望眼世界，戰爭頻發，硝煙未散，人心被不安與撕裂所充斥。翻開以賽亞書，在十一章與六十五章，那幅關於未來和平的圖景，猶如一道光穿透現實的陰霾，令人心馳神往。「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賽十一6~9，六十五25）。這些描寫不僅是詩意的語言，更指向一個終極的應許：新伊甸園、新天新地；在其中，衝突止息，生命和諧共存。

(接封底裡)